

書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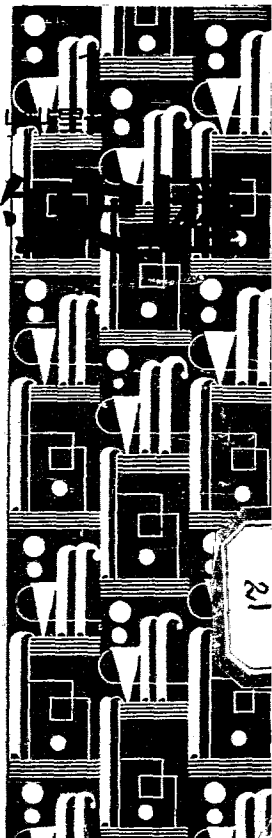
# 秘奧的

蒼馨紺

續書八會惠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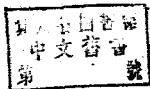
朱恒先贈

元印行社出版文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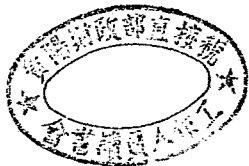
10413  
21



二之書叢草野

# 秘奧的史歷

著 考 紺



行印社版出獻文

月六年十三國民華中

## 歷史的奧秘目錄

題記	一
父親	四
巨像	二二
歷史的奧秘	二〇
記周作海	二六
游呂列芬	三二
從陶潛說到蔡邕	四一
——詩十	
詩仙的啓示	五四

失掉南京得到蘇窮	六四
莎士比亞應該後悔	七七
飛機的用途及其它	八〇
汽油——藝術	八五
老子的全集	九四
魯迅的褊狹和向培良的大度	九七
從沈從文筆下看魯迅	一〇二
賂賂魯迅先生的野草	一一三

## 題記

我出書的運氣非常不好。八一三直前，我在上海。正直三本書要印，一本是小說集，「兩條路」，一本是關於語文運動的論文集「語言、文字、思想」，另外一本是文藝方面的論文和雜文集，「廬子的散步」。三本書每本都在十萬字以上。因為自己不是什麼大作家，找不到根基穩固的書店承印，只能交給幾個新辦的出版社。板排好了，有一本還校對過，不料八一三的砲火一響，那些出版社有的觀望，有的改途，無人負責，不久，自己也離開了上海，結果我的約莫五十萬字的文章，一齊連底稿也無影無蹤了。那三本書中最使我懷念的是「語言、文字、思想」，我是對於語文問題與語文運動曾經下過一點功夫，而且說了些別人所沒有說過的話的。

厚一點的書遭遇如此，剩下的就只有兩三萬字一本的小冊子了。這一本是第

四本，這是字數最多的。

這本小冊子以抗戰以來所寫的雜文為主，也略用了幾篇以前寫的。這中間應該還有幾篇文章，因為沒有存底，沒有收入。其一是一「瑪德里曲不可以唱」，發表於抗戰前的自修大學，並曾為南京某報所轉載，是為陶希聖反對唱瑪德里保衛曲而作。其二是一「死的教訓」，發表於武漢淪陷前的大公報戰綫，是指出汪精衛的文章中的漢奸理論的可怕處，其三是一「談是非」，發表於武漢的「哈崗」，是糾正崇拜會國潘胡林翼的見解之錯誤，忘記了是對誰發的。其四，其五題目都忘記了，但記得內容都是反對汪精衛的言論的，離開上海時，曾交給夏衍先生代投某刊物，或者被認為苛論吧，終於未見發表，原稿也自然石沈海底了。那些小小的文章，自然誰也沒有注意，然而在我自己，是曾經用我的真知灼見燭照了那般妖魔鬼怪的。因此，我懷念它們。

我本來下過無數次決心，不寫雜文。並不因為什麼高尚的理由，主要的是因為不是生意經。既然美其名曰以賣文為生，就應該使自己的文章能夠賣多點錢，

以便「生」得像樣一點。雜文一則無從寫得很長，以換取大筆的發表費；二則沒有書店肯出版，讓稿子在發表之後再賣一次；三則每篇文章如果只能賣一次，作者除了餓死，就只有改行。三則沒有稿費的刊物，可以毫無愧怍地向你要稿，要不到還可以發皮氣，其意若曰：別人的長篇大論，費了很多心血，自然不使強要，至於閣下的大作，不過區區雜文而已，文章一篇，字數用三千，有沒有稿費，何足掛齒？四則……，五則……寫雜文而氣悶的事還多，最重要的是懸證也證不起，不過這與生活的直接影響還少，姑且不談。

不料這回來桂林，偏寫了一些雜文，而且還能出這一本雜文集子，這是應該感謝野草的編輯同人的。

不過也許是一種啓示，我写的文章實在太雜，幾乎沒有一種文章沒有寫過。雖然寫過各種各樣的文章，却沒有一種文章寫得好，只有這雜文，有時還聽得到拉稿朋友的恭維。那麼，也許我的全部作品都應該叫雜文，寫雜文也許正是我的看家本領，而這本小冊子反而是我的「代表作」！那麼，那麼，去吧，我親愛的雜

文，人間的冷眼正等候着你！

## 父親

中國有一句老話，叫做「生死人而肉白骨」。還有「使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一句話。則以和上一句完全不同的含義被使用着。我以為這兩句話底意義應當是一樣。在古舊的使用的場合，前一句話大約是感恩戴德；後一句話則是對於所誣聖賢豪傑底特立獨行的稱頌。無論在那種場合，都是對個人說的，一方面顯示着個人，一方面也把用語底意義弄狹小了。以現在的眼光看來，這是一種僞妄，無論個人有多大的力量是不能誇大到這種程度的。世界上有一種真能生死人而肉白骨，真能使頑夫廉懦夫立的力量，但決不是個人而是這時代。

我們生活着的這一時代，是個偉大的轉換時代，也就是革命和反革命，壓迫者和被壓迫者的勢力鬥爭得最激烈最尖銳的時代。在中國，一方面是國際帝國主



義（現階段上尤其是遠東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漢奸賣國賊們的勢力，一方面是漢奸賣國賊以外的人民大衆的民族革命的勢力。在這尖銳的鬥爭中，一方面是無數的民族英雄爲民族解放而獻身的表演；一方面是民族底敵人底瘋狂的殘虐。這兩種相反的行爲，無論那一種，在一定的情勢之下，都可以使人啟發，自覺而勇敢。用老話說就是，死人也可以使他活，白骨也可以使它長肉，頑者廉，懦者立。

把轉換時代底這一意義具體地表現出來的是高爾基底「母親」。母親，是一個沒有知識的老朽的人物，對於這社會底本質的不合理，一點也沒有理解。然而因爲目擊在工廠裏做工的兒子及兒子底同志們底英雄的獻身，和工廠主，官僚，警察，軍隊們底一貫的殘暴，自己也終於覺悟而成爲最前綫的鬥士。固然，你可以說，因爲獻身的被殘害的是她底兒子，所以她能自覺，沒有甚麼希奇。但是誰說過，革命是完全出於所謂自由人，第三種人底同情，義憤，而路見不平，拔身而起，拔刀相助麼？要是沒有，這正是以證明革命這件事，大而言之，和全階級底利害；小而言之，和個人底私生活密切地關聯着呀！

並且，革命的火種如果還沒有燃起，那是另外一件事，如果已經燃起，那就無論壓迫者用怎樣殘酷的手段來摧殘，屠殺，也決不能使那火種熄滅。剛剛相反，只有更煽起這火使它擴大而加速燒燬自己底台基底速度！爲甚麼呢？因爲這瘋狂的行爲，一定會增加敵階級底憤怒，一定會加強戰士們復仇的決心，一定會使本來猶豫觀望着的人們，加深自己底認識與勇氣。那末，在這樣場合，如果說不清楚地了解這鬥爭底嚴重性，最容易鼓起復仇的決心和勇氣的往往是鬥士們底家屬尤其是疼愛兒女的父母，應該是用不着怎樣解釋的。

我在東京的時候，日本文化界遭遇了兩件不幸的事，一件是理論家藏原惟人底被拘捕，一件是作家小林多喜二底被拷打而死。和這兩件事相關聯我碰到了一個和高爾基底「母親」里頭的母親一樣的人物——藏原惟人底父親藏原惟郎。

第一次知道老藏原是在一家書店底書架上看見藏原底論文集「新興階級與文化問題」，這集子是藏原在入獄以前，用好幾個筆名，在好幾個刊物上發表過的文章。入獄以後，由老藏原被集起來出版的。末尾，有他一點短短的「書後」

書後，從他自己到監獄裏去探望羸羸的經過說起，隨後說到這案子內幾篇文章底來歷；末後，「爲了他（顧原）和他今後恐怕一刻也不忘記的新興文化運動，希望這本書爲關心推人底理論與實踐的所有的人們所讀到。」這，也許是點平常的文章，我當時却受了很深的感動。

小林被打死之後，老蔣原在「文學新聞」上發表了一篇哀悼的短文。短文末尾，他對文化運動者們表示了這樣英勇的態度：

我決定把身體弄強健，無論到甚麼地步，也做你個底後援者。我看見你們底鬥爭的英雄姿式，就抱着絕大的快樂和希望。爲了做你們底後援者，無論會陷入怎樣悲慘的境遇，也不敢辭，請對你們全部地這樣說吧！我是除了這辦法以外，沒有甚麼活下去的心情的。爲鬥爭，那怕只活一天，也就很夠了，我想。……請君莫把小林君底死法譯成白死了哇。

這是多麼真率的，富於刺激性的文章啊！不錯，老蔣原大概已經上了六十歲的高齡，並且他自己也聲稱過，對於文化運動也不很了解，但最還有什麼關係呢

？我們生在道生死人而肉白骨的時代，讀者可以麼，儒者可以立，「老」或者「不很了解」怎能阻止人成爲一個鬥士呢？

中國是個半殖民地的國家，壓迫着中國人民大衆的勢力更爲複雜，方式也更爲殘酷而野蠻。在殘酷而野蠻的壓迫之下，我們已經有無數的英勇的犧牲者；那末「母親」里頭的母親和藏原惟人底父親那樣的老英雄是不會少的，梅世鈞烈士（讓我們對我們底死者致敬吧！）底父親梅耀宗先生就是一個；所不同的是，梅耀宗先生不僅是個階級的鬥士，同時又是個民族的英雄罷了。

梅世鈞底死和五卅前夜的顧正紅遇害沒有什麼兩樣。但顧正紅一死，掀起了巨大的五卅浪潮，梅世鈞案件却沒有掀起同樣的後果；這固然有種種原因，作爲決定的原因之一，就是現在遠東帝國主義加在中國人民大衆身上底枷鎖更爲沉重，更爲嚴密；效忠於遠東帝國主義的漢奸賣國賊更爲衆多，更爲無恥了。遠東帝國主義強盜對中國的壓迫，已經用不着拿梅世鈞案件來證明；它底暴行已經超過這樣案件千千萬萬倍，而且還要加大增多，一直到完全併吞中國的時候。那末，

回答這種暴行，當然而且也必然含有超過五卅，超過過去任何運動千千萬萬倍的偉大的運動，在全國全民族的偉大的民族革命運動總暴發的前夜，千千萬萬的人民大衆走向民族革命的戰棧上來，是意料得到的；在那里頭，我們就看見了是過去的犧牲者底骨肉至親的梅耀宗先生，和他所發出來的宣言（給文化界救國會的信：）

梅世鈞同志是我的兒子。他慘被日帝國主義者打死，我應該緊拳擦掌犧牲我自己的生命爲他復仇，但在事實上，未能盡爲父的責任，反而受你們各種優越的撫恤和慰安，這是我引爲最難堪最慚愧的事情。

我摯愛的先生們，在阿比西尼亞的滅亡中，在中國東北土地的淪亡及梅世鈞同志的慘死中，我才深知道帝國主義的殘暴中國漢奸們之怯懦卑鄙無恥；中國工農勞苦大衆要想免除飢餓貧困，失業的痛苦而走上求生的大路，只有快快自覺起來，憑着自己階級的力量，與世界弱小民族及平等待我之國家共同攜手，努力前進，才能夠消滅吸取人類大衆血汗的強暴者，剝削

者。

親愛的先生，我現在很鄭重的向你們宣誓我要把我的熱血與頭腦貢獻給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誓爲自己工農大衆的兄弟們而奮鬥犧牲，做你們領導下的一個戰鬥員；這樣才對得起梅世鈞同志才對得起革命領導者的你們才對得起世界無產階級的兄弟姊妹們：——救亡情報第九期——

以文章而論，梅耀宗先生底宣言，缺少像老藏原底文章那樣感人的迫力也未可知；可是朋友，我們現在不是衡量文章的時候；在我們眼前的也不是衡量文章的事件。梅耀宗先生告訴我們：帝國主義強盜殺死了他底兒子，破壞了他底生活底平衡，或者還打滅了他底精神底寄托乃至衣食底倚靠；他除了參加民族革命，再沒有路走。梅耀宗先生又告訴我們：有成千成萬的中國人民大衆，像他底兒子一樣，被帝國主義強盜屠殺了；那些成千成萬的人民大衆也一定是更多的人民大衆底兒子或父兄；帝國主義強盜不但奪取了成千成萬的人民大衆底生活；那些更更底更更底大衆，已經，正在或將要和他自己一樣，走向民族革命的戰場上來，梅

耀宗先生遺告訴我們：那些走向民族革命戰綫的人民大衆中間，固然有不少的人像他自己一樣，能夠用文章表示自己砥決心，更多的却是鐵一樣沉默默；固然有不少的人能夠像他自己一樣地大澈大悟，一定也有沒有這麼高的理解，僅僅單純地爲了復仇，單純地爲了失掉了生活的路。那正是些貧苦的人民，無依無靠的人民，甚至是無智無能，文化，教育，知識，道德的國土以外的人民；然而把每個這樣的人民結合起來也正是真正能夠打倒帝國主義強盜，斬盡殺絕漢奸賣國賊的偉大的人民。成千成萬的人民死了，然而成千成萬的人民活了；無數的人民變成了白骨，然而無數的白骨變成了人民；頑夫廉，懦夫有立志，這一切都是民族革命運動底基本隊伍。

那些走向民族革命戰綫來的人民是偉大的；梅耀宗先生也是偉大的。可惜我不是一個作家，尤其不是像高爾基那樣偉大的作家，不能把這些偉大的人民鑄成典型，表以形象；辜負了我們底時代，也辜負了我們底民族英雄。

一九三六年某月於上海

## 巨像

朝暉透過清晨的薄霧，斜射在我的頭上，臉上和周身。我站在一個懸崖的邊沿，面前的大地像被一刀削去了似地沒有了。百尺以下，是咆哮着的流泉，從那峭壁上橫斜地伸出野草，雜樹和叢竹，它們帶着晶瑩的露珠在晨風里徜徉。從野草，雜樹和叢竹的掩映中，流泉送來破碎的銀色的水光；和朝暉的黃金的光，和草樹的碧玉的光，錯雜，交綫，像狡黠的少女用誠言和謊語織成的情話擾亂你的心曲一樣地眩耀着眼睛。

一百種小鳥在樹叢里歌唱，密語，那是司音的女神在愉快地撥弄靈巧的琴絃。它單純可又繁複，擾攘同時清幽，莊嚴而詭譎，平凡亦新奇；低訴里突起一聲高歌，短曲中拖出無盡的長調。我想像着一羣能言的稚子和學語的嬰兒睡醒後的那一片天橫的曉舌！



抬頭遠望，那天邊是遶遶的羣山。繚繞的白雲，疏薄的宿霧，本來混淆了山影和長空的顏色，抹去了天和地的限界；多謝朝霞的襯映，那限界又重新清晰。從山脚一直到眼前，是一片廣闊的田野，菜花和豆麥的顏色裝飾着多采的大地。高低起伏的田壟把地面畫成一面不規則的棋盤，蜿蜒的村路和溪流又粗率地把它割破了。

三三五五的村落，隱蔽在蔥蘢的樹蔭里；低矮的屋頂冒出縷縷的炊烟。村路上，農夫們挑着籬筐或糞桶走着；牧童趕着牛犢；一匹黃狗正在尾追一匹白狗；女人們蹲伏在水邊洗菜，搗衣服，幾個還離不開媽媽的孩子在她們背後玩耍；近一點的村子里送來幾聲斷續的鷄啼……

這一切是多麼平凡囉！恐怕幾十年，幾百年，甚至更多的年辰以前，這地方就是這樣吧；以後多少年，恐怕也仍將這樣吧！廣大的祖國，多少土地上都有如此美好的春光；三十幾年的時間的洪流里，登山涉水，更不知欣賞過多少日出的奇景。可是今天，這遠山，這田野，這村落，這從村落走出的人和牲畜，都使我

感到分外新鮮；也分外親切。

我不是留連風尚的人，我不喜歡游山玩水，我所出生，成長和生活過的城市和都會，也沒有什麼山水好游玩。我不知道自然景色怎樣會有迷人的力量，走過許多地方，看見過許多名勝，常常發出一個稚氣的疑問：所謂風景也者，就是這麼一回事麼？如今，我在鄉村裏度過了差不多一年的時間，是我在鄉下住得最久的一個時期。從夏到冬，從秋到春，每天每天都有青山紅樹，板橋流水，送到我的眼前。我會經看見過疏林的落日，踏過良夜的月光；玩賞過春初的山花，秋後的楓色。綠楊嫵媚；如青春少女；孤松傲岸；似百戰英雄。高峯奇詭，平嶺蘊藉，各各給人一種無言的啓示。如果一個朋友，要交往越久，才相知越深，生死患難中，才有真實的情誼；自然的奧秘也應該不是浮華淺嘗，所可領會，那末，我對它們的低徊贊歎，豈不是爲了我和它們有了較長期的往還麼？

要這樣說也未嘗不可；可是朋友哦，我也到過遙遠的北荒，而且正是隆冬的時候。那裏沒有一根草，也幾乎沒有一根有葉子的樹，沒有花，沒有鳥，沒有河

水有薄綠的氣味；一望無垠，是黃色的塵土，是塵土的烟霧；不然就是白得耀眼的雪的山，雪的海，雪的一切。你能夠想像那裏也有人烟麼？能夠想像那裏的人也需空氣麼？能夠想像那裏的青春少女也像被扔棄了的廢芥，或者被拾荒的孩子們從垃圾箱裡撿出來的寶物麼？就是這樣的一個北荒，當我第一眼看見它的時候，我就愛上它了。我的血爲它而沸騰，我的心爲它而跳躍，我的眼淚在眼眶外變成了黑色的泥土！爲什麼呢？它是我們祖國的土地呀！是真正的古老的祖國的土地呀！雖然我和它們是這樣生疏。

今天，倭族的海盜踏進了祖國的田園。祖國的禾苗被他們的戰馬嚼食了，車輪碾倒了，砲火燒焦了！祖國的森林房舍被焚燒了，牛羊雞犬被宰殺了，沒有成年的姑娘，也變成了婦人死或活在他的淫虐之下了！祖國的大地整塊整塊地在魔手底下，鐵蹄底下，嗚息，呻吟，顫抖，掙扎，憤怒！強盜所到的地方，縱然也是春天吧，我不相信太陽仍舊是溫暖的，夜晚仍舊有星星和月亮；也不相信地上有綠的草，紅的花，樹林裏仍舊有黃鶯，麻雀，蚱蜢或毛毛蟲；更不相信屋頂

能買出炊烟，村路上還有頑皮的孩子和孩子们的伙伴：公牛、母牛、黃狗、白狗、老雞或小雞！

然而那些地方是我們的呀！昨天還是和我看見的這地方一樣的呢！一草一木，一石一水，都和這裏的一樣自由，一樣無憂無慮，一樣任意地發露自己的生的機能，賭賽着各各的美豔的呀！一想起那些受難的土地，自己的家鄉，腳印到過和沒有到過的地方，一面爲它們擔憂，爲它們痛苦，後悔平常沒有留心它們，沒有和它們周旋滋養，給與應該給與的熱愛；一面也就對這自由的天地，增加了無限的情愫；正像魂香冷漠了凋零了的故舊，就覺得殘存的眷屬都是可親的一樣。雖然明知失去的土地終會回來！

太陽漸漸升高了，長空顯得更爲明淨，村路上的行人也更多了。農婦們從什麼地方抬來幾個担架，那上面大概是傷病的戰士，向那水邊的一個村子裏走去；那村裏有一個大祠堂，是我們的戰地醫院的所在。她們一面走，一面唱着什麼歌；歌聲傳到我的耳邊，已經很微弱，但是還彷彿聽見了這樣的詞句：「抬傷兵，

作茶飯，我們有的是血和汗……」兩個女兵從那村子裏出來，手挽着手，腳步和着腳步，大踏步地從那橋上走過。她們和那些農婦們打招呼，詢問担架上的病人，接着也唱着什麼歌走開了。她們也許是去治療了被蚊子或者別的什麼小生物損傷了的皮膚，或者是去拿了金鷄納霜片——疥瘡和擺子是她們永久的友伴；不過也許是去慰問過什麼病人，現在又要出席民運會議去了。

另外的村子里走出一隊學兵。他們背着槍彈背包和雜糞，每個人都提着一個蒲團，一望而知，是到山上上課去的。同時，戰士們也全付武裝，整隊地在路上走，不知是去上陣還是去打野外。

突然，遠遠地傳來一陣鑼鼓聲，砲仗聲，一大羣老百姓在那幾乎看不清楚的遠處顯現出來；走在頭上的似乎還高舉着旗幟之類的東西。他們也許是到部隊裏獻旗去的。但今天并不是什麼特殊的日子，這麼早也沒有什麼大的集會；那末，一定是送壯丁入伍了。這裏的壯丁，沒有什麼花名冊，用不着抽籤，更不需要繩子纏綁和軍醫的押解；僅僅因為我們的部隊沒有徵發他們的財物，不少給做生意

的人們的錢，沒有調戲他們家裏的媳婦和姑娘，而女兵們到他們家裏去的時候，說話又那們和藹。「我們不擴充部隊呀，我們的名額都滿了哇！」可是總是三個五個，十個八個，今天從這個村子，明天從那個村子，繼續不斷地送來。每回送來，又都像辦什麼喜事似地熱鬧。

三十幾年，我都過的一種個人生活，不知是什麼東西把我和別人隔絕着了。我不知道世界是什麼，人類是什麼，它們和我有什麼關係；它們也從來不曾感覺到我的存在。雖然每天在人海裏浮沉，雖然也學會了把「社會」，「集體」這些字樣掛在口邊；其實只是一個荒島上的魯濱孫；並且似乎一生下來就是這樣，並且連半個禮拜五也沒有。

可是今天，我多麼高興呵，從那些農婦們，女兵們，學兵、戰士、壯丁們那裏，突然發見了我自己！我和他們在一塊兒工作，我是他們中間的一個；從他們身上，可以找到我的心和手的直接或間接的痕跡。我再不是一個孤獨的個體，我和世界，和人類是一起的；尤其是和這些爲祖國爭生存自由的人們，搶救着祖

國的每一塊失去的土地的人們，創造新中國，新人類的人們是一起的！我多幸福哇，和他們一樣，我也有肉、有血、有汗、有體力、有智慧；我把我獻出來，而他們並不拒絕我，並不把我當作一個陌生人看待！我第一次感到自己生活在世界上，生活在人們中間，雖然我是這麼渺小，我的力量又這麼微弱！

我站在懸崖邊上，昂着頭，挺着胸，手插在腰裏，眼望着遠方；朝日從遙天用黃金的光彩裝演着我，用母親似的手掌撫摸着我的頭，我的臉，我的周身；白雲在我頭上飄過，蒼鷹在我頭上盤旋，草、木、流泉和小鳥在我的腳下。晨風拂着崖邊的小樹的柔枝，却吹不動我的軍裝和披在身上的棉大衣。我一時覺得我是如此地偉大，崇高；幻想我是一尊人類英雄的巨像，昂然地聳立雲霄，為萬衆所瞻仰。過去的我，却匍匐在我的面前，用口唇吻我的腳趾，感激的熱淚滴在我的腳背上！

## 歷史的奧秘

托洛斯基先生薨逝了。多年流離轉徙中的托洛斯基先生被「暴徒」所刺而薨逝了。據報紙新聞欄介紹，托洛斯基是十月革命的「重要領袖之一」。這十月革命的重要領袖之一的托洛斯基，到了由十月革命艱難締造出來的蘇聯穩固，壯大而且正發展下去的今天，自己却在流離轉徙中被刺而薨逝了。

在薨逝之前，托洛斯基是活着的，這大概無須說明；不過這活着，在托洛斯基應該是一種悲哀；他，這十月革命的重要領袖之一的活着，不是因為由十月革命艱難締造出來的蘇聯的存在，竟剛剛相反，是因為反蘇勢力的存在。同時，他的薨逝，在他也應該是一種悲哀；因為反蘇勢力的存在而活着的他，不被刺於蘇聯，却被刺於蘇聯以外的國土——反蘇勢力也終於不能保障他的安全。

托洛斯基的活者和薨逝 也真可以說是英雄末路了！



中國也有像托洛斯基的人物，比如汪精衛就十分類似：托洛斯基英姿颯爽，常爲女性所追逐；汪精衛也一表非俗，年近六十，望之還如三十許人。托洛斯基是個演說家，理論家，政治家，軍事家；汪精衛也口若懸河，筆參造化，書畫琴棋，詩詞歌賦，無所不知，無所不曉。托洛斯基是十月革命的「重要領袖之一」；汪精衛則曾「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據說：對於中國革命的功勞也着實不小。托洛斯基在十月革命的當時，就與另一重要領袖的意見有多少出入的吧，但不肯屈居人下，「恭與鋒鏑爲伍」；却是那一重要領袖死後的事；汪精衛在國父生前固然常受批評，而發了最大的政治力量的，也還是在國父死後。前面說過，托洛斯基是「理論家」，他真也完成了他的獨特的理論系統，以他的理論爲根據，他可以借重任何反蘇勢力打擊蘇聯；關於這一點，汪精衛也不弱，他的電報、宣言、論文、演詞、在許多地方，曾由「皇軍」的飛機替他散播，而他的電台的播音，更是常有的。他們的理論，也真有一個共同點：讀來讀去，就令人想起一句老話：「舍曰欲之，又從而爲之詞」！不過也有不同的：托洛斯基雖

然也借反蘇勢力而存在，造成了累累的「黨案」，却始終未在任何一個地方，建立起反蘇政權：汪精衛比較幸運，託「皇軍」的威光，在南京建立了反中華民族的所謂「國民政府」。但這雖然正是托洛斯基深引為憾，死不瞑目的事，却也并非托洛斯基和汪精衛之間有什麼差別，癥結在於蘇聯比中國強大。惟一不同之處，恐怕只在托洛斯基已經薨逝，而汪精衛却還健在。詩云：「時日易喪，子及女償亡」，這就是中國人民對於汪精衛應有的感想。

從托洛斯基和汪精衛，我想起一個歷史的奧秘。

「白鐵無辜鑄佞臣」，這是誰在岳王墳上題的詩句，簡直為白鐵呼冤，對佞臣深惡痛絕極矣。佞臣是指秦桧，雖然秦桧的惡德，不是「佞臣」二字所可包舉。

我不知道秦桧是否也和托洛斯基或汪精衛一樣，以不甘居人下，「秦與蘇灌為伍」始，以「放僻邪侈，無所不為」終。但借敵國的力量打擊祖國，翦除異己，削弱祖國對敵國的抵抗，却正是同樣的。

抗戰以前，似乎有人說過：講和也是一種政治主張，秦桧不過主張講和而已。

。既然也是漢人，又確實不是大金國派來的選手，一定要把剩下來的半壁河山送給大金國的意思，恐怕未必有；縱然有，也未必多的。只是事情到了要貫徹一種政治主張，就不能不排斥別種政治主張和有別種政治主張的人，不能不使有別種政治主張的人流血的時候，到了不能不借敵國的力量來打擊政見不同的人，以至於斷送整個民族的生命的時候，到了因為不願看敵國與祖國人民的共同的血光，却不能不讓祖國人民的血單獨流洒的時候，却往往又作別論。古人說，賣箭的難道比賣盾牌的心眼兒壞些麼？一個惟恐不傷人，一個惟恐傷人。這就不是不是一種政治主張的問題，而是那政治主張對不對，以及能不能覺悟自己的政治主張或鬥爭方式不對，就馬上懸崖勒馬，痛改前非的問題。

談到秦檜很容易就想起岳武穆。有人會從一些書本子上找到很多材料，證明岳武穆不過是一個跋扈的軍人；其實這些是無需證明的。人只要有腦經，只要腦經能夠思考，就會想像到書本子上沒有寫下的許多事情，何況已經寫下了的呢？岳武穆既然是一個軍人，不能完全擺脫當時軍人的風習，他又有自己的政治主張

也和別人一樣，要貫徹自己的政治主張；所謂「跋扈」也者，安知不就是一種意志堅決的表現呢？

我們把岳武穆當作神聖，把秦檜當作反派代表，很少是關於他們個人人性的問題；雖然人性的美惡，往往是一個重要樞紐；可是在他們在歷史舞臺上所演的角色，就是說他們所盡的任務，所能發生的作用。一個人演了神聖的角色，他的一切缺點，一切過失，甚至一切罪行，都被他所盡的任務遮住，洗清了。不但這樣，還有許多實際上與他毫不相干，而在當時是可能的神聖的傳說，都全被加到他頭上，使他更爲神聖。還不但這樣，好事的人們還一定要把他的父母妻子親戚朋友無一不神聖化起來，以顯得他的神聖並非偶然。如果演的相反的角色，不言而喻，神的一切美德，會被「君抹煞，一切醜惡都和他脫不了關係，而父母妻子親戚朋友也就沒有一個好人，那末岳武穆就有不名譽的什麼，首先就不會被寫史書的人寫上去，縱然寫上去，也不會被讀者所重視。至於秦檜呢，也許跟托洛斯基或在精術一樣是個才子，能夠吟詩作賦，有等身的著作，是個演說家，能夠在

露台上便驚飛或動得流淚，以及其它說不盡的豐功偉烈；可是那些都不留存於我們的腦海裏，也不留存於歷史家的筆下；留存的那一付骨容，實在太不漂亮，雖說真實的肉體的臉龐，也許經過梅爾芳。

這是歷史的奧秘，也是歷史的可怕處。就今天說，祖國的抗戰和蘇聯的建設一樣，都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誰能欺身抗戰，堅持抗戰，誰就是民族英雄，誰就是留武穆；已有悠久的光榮歷史自然更好；雖然沒有，縱然有的不發光榮，也毫無關係。誰要是背叛抗戰，打棄抗戰，誰就是民族罪人，誰就是秦桧；不管過去怎樣了不得，而且，背叛，打棄抗戰，事實上也絕不可能，徒然使自己走向滅亡，也就是托洛斯基的路而已。

托洛斯基和汪精衛都是多才多藝的「天才」，他們的部分的著作，也都曾膾炙人口，但是歷史的大力將毫不顧忌地把它們完全摧毀，將來的人將簡直不知道或不注意托洛斯基和汪精衛其人究竟有什麼能耐，正像現在的我們不知道或不注意秦桧有什麼能耐一樣。只有他們的名字不會被忘記的，它們將永遠作為人類史

上的污點而存在。

一九四〇、九、九、桂林

### 記周佛海

最初認識周佛海先生，還是北伐以前的廣州。那時候他在廣東大學當教授，我在準備考黃埔，本來井水不犯河水，爲一點小事，却認識了。

誰都知道那時候的廣東是革命策源地，廣州市的革命空氣，簡直濃厚得像牛油一樣；我是個在山陝小縣讀詩云子曰的孩子，快二十歲才離開家，離家以前，連世界上有一種東西叫做白話文的事都不曉得。雖然跑了幾個地方才到廣州，廣州街上的標語，報紙上的言論，在我看來，真是目迷五色，萬花撩亂。爲了考學校，爲了希望不落第，對於那些從來未聽見過的新東西，不能不先有點了解。於是除了自己抄命讀書之外，碰着人就發問，不用說，那些問題都是極其幼稚的。

。我只認識兩三個人，不到幾天都被我問倒了，我自己尤其窘，因為考期就要來了。有一天，朋友對我說：「我引你去會一個人，他很有學問，一定能答復你的一切問題」。誰呢？周佛海先生。

我已經不能記清會見這位教授，學者，革命家的時候的榮幸和會見以後的感激了。總之，他給我解答了許多問題，解答得非常詳盡，尤其是帝國主義，軍閥這些古怪的名詞，他說，不一定帶兵就是軍閥，不一定有皇帝就是帝國主義，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到了最後階段，必需向國外找尋市場……他說馬克斯說什麼什麼，列甫說什麼什麼……一大段一大段的理論，滔滔不絕。使我這從未見過世面鄉下的無知的孩子，聽得目瞪口呆。我完全不像我的朋友和我講話的時候那樣容易提出問題了，記得只提出一個，問馬克斯是不是中國人，問得他和我的朋友都笑了。不過他還以為我的話有什麼言外之意，接着就告訴我：真理是沒有國界，沒有任何畛域的，青年應該有接受真理，為真理奮鬥犧牲的勇氣。並且引出見義勇為，見危授命等中國古聖先賢的道理，我想，我現在站在一個學貫中西的

六人物面前，莫非是在做夢麼？

受了他的教之後，我覺得我突然聰明了，用白話文著的書，書上的一些怪里怪氣的話，也不再念不上口了，而且考黃埔一考就考上了。當然，那時我決不讓這從黃埔出來之後，仍舊只寫寫「記周佛海」這種無聊文章的。如果知道，你還考它幹嗎呢？

再會見他的時候，是十六年，在南京中央黨務學校，就是現在的中央政治學校的前身。那時候，我在那學校里作事，聽說周佛海先生要來教書，我高興極了。說起來很不敬，那學校里的教授們，自然都各有所長的罷，可是在政治經濟方面，似乎並不比我強得多少，這自然是一種青年的狂妄的看法，其實並不然的。還有許多問題要請教，却找不着師傅，現在我原來的老師周佛海先生要來，怎麼不喜呢？我想，他來了之後，我一定天天到他房里去，挑一大担問題去問他，不消三兩個月，一定會有可觀的進步。

沒有幾天，我在學校里的小組會議的預備會議上碰見他了。同學們每週要舉



有一次小組討論會，由教職員分別出席指導，在出席之前，彼此交換意見，免得言人人殊。這交換意見，我們就叫做小組會議預備會議。參加這預備會議的有羅傑倫先生，段鶴朋先生，康澤先生，谷正剛先生……末座叨陪的是區區我。這一次之又添上了周佛海先生，討論的問題你說巧不巧，却是「什麼是帝國主義」。開始討論時，我說，這問題還用得着討論麼，周先生報告一下就行了。再說一次，以上的諸位先生無不各有所長，而現在又無不功業彪炳了，但那時候，我以為對於「什麼是帝國主義」這問題，了解得最為透澈的，應該是周佛海先生，因為我聽過。這也不是我個人的私見，我一說出，大家都同意了，周先生自己也當仁不讓，沒有表示異議，如是就報告。

「帝國主義的成因，由於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人口、宗教……」

滔滔不絕的名詞，俗語，例證，比喻，從他的口里出來，隨着唾沫一齊噴到我們臉上，恐怕有一個鐘頭之久。只是話裡頭沒有馬克思什麼的，見解也似乎有一些不同了。他講完之後，幼稚的我就問：

「這些原因之中，是缺一不可，同等重要的呢？還是有主要的和次要的之分呢？」

他答覆了。可惜不記得。再說一次，我很幼稚，幼稚的人往往狂妄，近時候我竟不以他的答復爲滿足，甚至因爲他的言論矛盾而起了一點反感。於是我提出了新的疑問：

「帝國主義，是不是與資本主義有關係呢？比如說，資本主義發展到了某種程度……」

「這不能討論」，他說，「這是×××的理論」！×××代表一個遠禁品。

我的老師，這不正是你從前告誡我的麼？爲什麼現在「不能討論」了呢？不能討論就不能討論罷！爲什麼還加我一頂性命交關的帽子呢？難道我的血還值得給大人物洗手麼？不過在會場上我不能這樣說，可也不能無理由地撤回已經說出口的話，於是我謙虛地同時也狂妄地笑着說：

「請原諒，我沒當過×××，不知什麼是它的理論，什麼又不是的。自然不

必捨人牙慧，可也似乎沒有在任一點上故意弄得和他們相反的必要，因為真理是沒有畛域的。如果人家說地球是圓的，我一定要說是方的；人家說白天是白天，我一定要說是黑夜，那我豈不是以反對他們為職業了麼？

這樣一來，我的一個夢幻滅了。本以為可以向他叨點教的，倒弄得連碰見的時候，點點頭都很勉強。以後不久，我離開了那學校，不但不會碰見他，連他的名字也不容易聽見。到聽見的時候，他已經追隨他的汪先生到「大日本皇軍」那裏投効去了。

以上這點短文，本是一篇已經發表過的文章中的半篇。原文是記兩個人的，因為自己和幾個朋友都覺得記周佛海的這半篇較好，故在此重新發表一次，以表示現在不是半篇，而是一篇獨立的短文了。

一九四〇、六、一〇、桂林

## 游呂菊芬

「游呂菊芬」這名字，是不會從中國歷史上搥掉的。因為她是大日本帝國皇二底前驅，並且和她底同志大詩人黃秋岳即黃游總書父子一道，壯烈地殉了她底空軍的職務。榮幸得很，這位女英雄底先生曾和我有三十天師生關係，說起來她應該是我的師母。「不爲之後，雖盛不傳」，我似乎有傳一下她底盛事的義務；現在就讓我們來追念她底一點嘉言懿行吧。

國民政府定都南京那年的秋天，南京唱經樓到黃泥岡之間，出現了一個「東文補習夜校」；那夜校附設在一家醫院裏面。辦夜校的是一位叫做游××（無爲？）的福建人；瘦高身材，黑黑的面孔，薄薄的嘴唇，像是有點精幹的傢伙。那夜校里有十幾個學生，我就是其中的一個。

不知怎麼一來，我們底老師游先生知道我在某機關作事了。有一回下課之後

我找到一間什麼房里去坐，說是有話跟我談。那房里先有一個女人，很矮很黑，面色蒼白得像新刷的石灰墻子；青的脈絡，一條條地凸出着，眼睛似乎有點紅腫，又似乎並不，不過很無神。經過游老師底介紹，知道是他底太太，名叫呂。在這醫院里當產科醫生。這產科醫生，當時以及後來所給我的印象是，沉靜，像永遠都不動，不開口；就是動，開口的時候，也僅僅沒有動沒有開口的一樣。她在她臉上或別處找出一點表情什麼的，幾乎不可能。

我們的老師首先很客氣地向我表示他剛從廈門來，打算在南京找點相當的工作，一時還沒有成功，只好暫且教日文混混。隨後就和我談關於宣傳方面的事。他打聽，這是我底本行。他說：國際宣傳頂要緊，應該叫全世界的人都研究，信仰我們底主義，應該收羅各種外國語人才，把三民主義翻成各種外國文傳播到全世界去。懶得很，我對於我底職業，除了每天坐在辦公室里，覺得腰酸背痛，想吃點「兜安氏紅色補丸」以外，並沒有考慮到這些問題。現在一聽，真是開茅塞，覺得自己自然不足道，就是那些在黨國負責宣傳重任的人，豈不也個個

都是做甚麼？

「其實，」辦老師說，「其實這是很容易辦的呀，只要肯做，不愁沒有人翻，比如我，早就用日文翻好了一部三民主義，可是沒有地方出版。……」

「葛先生！」太太接着說，她是這們客氣，反稱我爲先生，「你那邊，聽說不是常常印很多書麼？你可不可以去問問看，如果肯出版，就把他底稿子拿去。」

「我得申明，」先生接着說，「完全無條件，只要於宣傳主義上有點幫助。」

……

即使「世故淺」是句好話，我也只好用這話來恭維我自己。因爲我常常去上官那里問道。上官拍着經驗豐富的面孔說：你沒有到各個旅館去看麼？那里滿坑滿谷，盡是找差事的；上官建議的也有；光只賣賣字賣賣文章的也有；自然賣外國文的也有。你瞧——他教我看他背後的一口立櫃——裡頭全是黨義底譯稿，也全是那些人們送來的。你以爲裏有譯得好的麼？一個也沒有！如果有這樣多

的譯手，我們底事情就好辦得多了。

我似乎受了點侮辱：我底老師，何至于這樣變態呢？於是力學這個人怎樣與衆不同。好在上官也弄不出什麼，多收一份譯稿，也未必增加多少麻煩，就叫我把稿子拿來看了再說。他倒真認真地去看稿子的時候，你猜那位老師怎樣？他說：「真先靜安呀，靜安了才好動手翻咧。」原來他還連手也沒有動！夜校辦了一個月就不辦了。原因是老師已經在什麼軍事機關找到了「相當工作」，上最後一課的時候，他已經「裝革履」，精神百倍地告訴我們說「沙約那拉」。於是一個月的工夫，四塊錢的學費，過了幾天，連五十一個字母，都爲了先生「沙約那拉」的緣故，也跟我們「沙約那拉」了。

「沙約那拉」之後一年光景，我在殖政牌樓一帶發見了原先掛在唱經樓的那塊「呂菊芬產婦科」的招牌現在掛在一家產科醫院門口，並且只有那一塊醫生招牌，顯然現在是獨立門戶了。正在這時候，有一個朋友底太太要打胎。

年青的女士們，大概也和男士們一樣，證原有有了愛人甚至結了婚，但交幾個

異性朋友：那怕井不就和戀愛之類有關係，也決不覺得是一件毫無趣味的事。在和異性做朋友的時候，男士們也一樣，如果別人不知道，往往不大願意表白自己已經「物各有主」；好像「表白」那點可憐的友誼就完了，豈但不表白，還惟恐別人從別的方向知道。如果井沒有申明已有配偶，忽然一天被人發見肚子大了，在年青的女士們，總曾有些難堪的。何況還有其它許多理由，都唆使女士們裁制自己底肚子！

不過我底朋友底太太要打胎，井沒有這些高貴的理由；簡單得很：那朋友底收入太少，她又已經養育着三個小孩。朋友曉得我認識那位呂醫生，一定要派我去接洽；我呢，我也自認爲有担任這工作的義務；如果因為滿人接洽面可以被省多少費用，於我底朋友，實在是個不小的幫助。

誰知道呢？誰知道我竟去碰了一鼻子灰！

「這怎麼行呢！這……」呂大醫生說：「這樣的藥……我們醫院雖小……人格……良心……道德……這樣的事……」



有誰看見過尊貴的人麼？比如說皇后，皇太后，忽然意外地碰見了什麼骯髒的東西，比如說——叫我說什麼好呢，總之是頂頂骯髒的東西，那該是什麼神情呢？我說，那不稀奇，就是呂醫生聽見說要請她打胎的時候的神情。不過，那居高臨下，那以正儀邪，那鄙夷，那嗤之以鼻的神情，却仍舊是沒法形容的。那時候，人們似乎還沒有熟習一種被稱為漢奸的人底品格，如果熟習，我想，在她看來，也還在要打胎和替人接洽打胎之流的人底十等以上。在那時候，我才第一次看見表自己底卑下，卑劣，乃至卑賤！

然而我們底尊貴者底話還沒有完，她說：

「年青人做事不好拆爛污……敗壞人家底閨門，也敗壞自己底德行，這樣的  
事……」

說到這里我才吐了一口氣，才恍然大悟她之所以深信不疑地取了那尊貴的態度的理由：她所能理解的打胎，和我現在所要介紹的打胎，完全是兩件事。唉唉。我還能對她說什麼呢？

然而一年以前我就應該明白我不能對她說什麼的，她和她先生即我底日語老師，曾經有一件事，教我看到了我和他們之間的障壁。

也是一回慌之下課，打一迴空房間門口穿過，看見那房里紅燈大亮，并且聽見許多人隱隱的聲音。把頭伸進去一看，那里頭跪着一滿屋子人：醫院院長，院長太太，醫生，幾個學看護的小姐，我們老師底太太，一齊捧着手，閉着眼睛，抬着頭，望着那壁上排的一張彩色的耶穌或者別人底畫相，口中念念有詞（不知念的什麼）越念越快，越快越念，就像正在受戒的和尙，熬不住頭頂上的艾絨的燃灼，只有口里不住地「阿彌陀佛……」一樣。過不一會，我們底老師也擠擁去跪在一塊兒如法泡製起來了。只有幾位看護小姐，似乎不及別人虔誠，一發覺有人在旁邊偷看，就低着頭，掩着口，甚至笑出聲來。

「那是做什麼呢？」

過後，我問我們底老師和他底太太，她們說是「降神」。太太並且說這降神曾有怎樣怎樣的好處，比如說，降到誰身上，誰就不生病，有病的就好，做官，

就一帆風順地往上升；一句話，「有意想不到之效力！」

我笑了笑說：「我倒是個想升官的，應該來參加，只怕神不肯降利我身上來。」

「那里那里！」太太說，「只要信仰，只要誠心信仰，……」

「你大概不相信的，」老師接着說，「的確是件奇怪事。別的不容易知道，神一來，人就失了知覺，不曉得自已說的什麼。以後，就精神也健旺，力氣也大  
了……」

「那是什麼道理呢？」我問。

「不曉得呀，」老師答，「所以奇怪！起初我也不相信……這醫院里的人也都  
都不相信，後來我勸他們試試，於是……奇怪得很。」

言下大有勸我也試試的意思。

從這時候起就完全覺得他們是另外一路的人，要是早記起來，我不會去「  
多少  
談什麼打胎不打胎，以致自討沒趣的……」

那末，爲了呂醫生底正氣，中國就多了一個國民，我底朋友底末！

打成麼？不，後來還是打了。那一定是別的醫生那里打的了？不，還是在她那！不過換了一個接洽人，預先講好手術費一百元，藥費住院費在外，結果，那位朋友花了兩百多塊，不但自己，就是朋友們（我也是一個）底錢都扯得光光如也了。

後來，朋友底太太說，那醫院里同時住着三個病人。就有兩個是來打胎的。阿彌陀佛！

現在這位女英雄已經成了仁，同時也成了名，我自然慶幸我有寫這篇追念文章的光榮，可是也有一點小小的遺憾：不知她底偉業和她十年前的那「降神」的盛舉有沒有關係？如果有，則早應該追隨她和她底先生之後，去參加一下那莊嚴的大典的，那麼，別的不說，這篇文章底材料總會豐富些吧。

魯迅先生週年祭日

## 從陶潛說到蔡邕

我們大概都讀過幾本舊書，知道幾個古人的名字和事蹟，那些名字和事蹟，不免有時在應子裡作祟，使我們在無論什麼場合，都會想到了們，只要有機會，就不自覺地街賣出來了。不然，周作人就是周作人，決不是陶潛和蔡邕；論周作人就論周作人，不會牽涉到陶潛和蔡邕的。

陶潛的「猛志固常在」等名句，魯迅和宋雲彬兩先生都曾稱引過；他不用劉宋年號，把劉宋比作蕞蕞，要不與同中國；就是「歸去來辭」上的「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羨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如果不是早年所寫，罵那般國家將亡，首先爲自己打算，賣官鬻爵，結黨營私的妖孽們，就是後來捕寫，藉以罵那般依附結納，趨奉新朝的新貴們的。至少，他和一般的所謂隱士，多少有些不同，更無論周作人。

曹聚仁先生說：「我是反對所謂隱逸的人生態度的。一個知識份子，當民族國家在作生死存亡的搏鬥時，應當奉獻自己的一切，聽政府作有效率的使用」。勤人積極，用意自然非常之好；但對於陶潛却不能說是平允之論。前半截的陶潛，正在經驗「戚士不遇賦」的生活，大有「奉獻」無門之概。幸而作了幾天縣長老爺，無奈官卑職小，天天送往迎來，打躬作揖，雖「奉獻」還是遠哉遙邈。後半截更慘，連可以「奉獻」的「政府」也沒有了，當然只好「戚吾生之行休」。「樂夫天命復然疑」了。然而陶潛果真沒有任何奉獻麼？倘把「奉獻」的尺度放寬，不必拘拘於吃公家飯，「聽政府作有效率的使用」，那麼，他已經奉獻了他的文章，他的氣節。退文章，這氣節，在曹先生看來，也許一錢不值；但孔子曰：「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在不能進取的時候，有所不爲，比無所不爲（放僻邪侈，無所不爲）總要好得多。假如汪精衛，周作人之流，能夠有所不爲，我們的抗戰形勢就要好得多。因之，足見積極不一定就好；消極不一定就壞，陶潛的隱逸也和伯夷叔齊餓死於首陽一樣，對於人類社會，仍舊算是奉獻的。倘說

他應該興起義師，爲民族討天復仇，道理自然更對。可也更近於紙上空談，陶潛在這一點上，也像伯夷叔齊：連飯都沒得吃，「飢寒驅我去」，就是證明。招兵買馬，積草屯糧的事，怎能寄望於他？而且也不是沒有人作過這樣的事，比如管蔡，自己賠了性命，還在歷史上留下兩張粉臉。

離開陶潛，曹先生的話，也不算完全的知言，所謂「隱逸」歷來就是一筆糊塗賬。和「仕」相對的隱，是不做官的意思；「終南搥徑」的隱，是準備做官的意思。李愿、孟東野之流，是「不得志於有司」，不得已向顯達的親戚故舊打一筆秋風了回家過日子；巢許沮溺是不但不做官而且不與聞政治或者還反對政治；袁中郎、袁子才不過因爲不做官比做官有更多的好處；諸葛孔明是「苟全性命於亂世」，李令伯和陶潛的下半世都是有家國之感，不事僞朝。「隱逸的人生態度」如此不同，現在概而括之曰：「反對」，至少，「不得志於有司」的人會說是「飽人不知餓人飢」。我們知道曹先生所反對的是怎樣一種人，不過錯扳了陶潛而已；但巢許沮溺二袁之流，却也未必是隱逸中之最應非難者。巢許沮溺本是田

野小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並沒有尸位素餐。天下有一種「大隱在朝」的人，滿腦子隱逸思想，或滿腦子沒有思想，從來不知政治爲何物，不想在政治上有何奉獻；却高官厚祿，嬌妻美妾，行屍走肉，誤國殃民，如買似道之流，不比真正的隱逸還壞百倍千倍麼？袁中郎袁子才等假隱士，斤斤於得失多寡，其實等於市僧。但所計較的究竟虛名多於實惠，比之於借「孝獻」之名，行市僧之實，如今日的所謂發國難財的，還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曹先生的見解是從焦循得來的，焦循說：「有周公孔子之學而不仕，乃可以隱稱；然有周公孔子之學則必不隱……」，不知道「周公孔子之學」，是在不隱中建立之完成；正因爲不隱，才成其爲周公孔子，才成其爲「周公孔子之學」；如果隱，首先就不是周公孔子，「道不同，不相爲謀」，怎能形成「周公孔子之學」呢？又說隱士們「立異矯世，苦節獨行則有餘，出面操天下之柄則不足……；出面操天下之柄則不足；是也不是也有人操天下之柄雖足，立異矯世，苦節獨行則



不足呢？歷史上固然有殷浩房瑁，是不是凡隱者不隱，就一定都是殷浩房瑁呢？諸葛孔明曾經隱過，何以一旦出山，又不是殷浩房瑁呢？

談到「操天下之柄」，一定要牽涉到社會構成，問題非常複雜。皇帝的兒子，被派定將來要操天下之柄；一等顯要的子姪門生，親戚故舊，往往不

過問他們的地位，在毫無憑藉的人，就會像「威士不

主」，況且少關於學力的足與不足。操柄的

人，未必就有見，也就

——

「也」。不做官的人們

自然不如「操天下之柄」的人的德政來

才；但他們也沒有「操天下之柄」的人所受的那麼多

在實際政治的束縛，因之有較大的自由可以表現自己。把自己的「苦節獨行」獻給人羣。蘇格拉底，柏拉圖，盧梭，達爾文，馬克思，愛迪生，高爾基等人的天才。如果操了天下之柄，他們的成就也就是奉獻，是否也像現在所有的這麼大，或者反而是問題。不用說，「操天下之柄」是重要的，然而不能人人都操，勢必

有些人要作些別的事。能夠有些「苦節獨行」，足以「矯世」，已經這勝欺世盜名的不「操天下之柄」者和禍國殃民的「操天下之柄」者。過於熱中的焦循，希望人人都是周孔子，天下豈有這等事！

焦循是過去的人，滿腦子周孔子是不足怪的；以「操天下之柄」爲讀書人唯一勝業與最高理想是不足怪的；奇怪的是平日「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曹聚仁先生，這回竟想起了焦循的唾餘而造成自己的有些昧於實際也有些狹隘的「奉獻」論。

現在讓我們來談談蔡邕吧。

蔡邕依附董卓，以此受人詬病。董卓在歷史上不會留下一付漂亮的臉嘴；但「村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至少，像王夫之說的：「卓之始執國柄，詭於名，而借賢者以動天下，蓋汲汲焉……」，所謂「王莽謙恭下士時」，也有這好的時候。政治上的成敗利鈍乃至邪正忠奸，由於政治家人性的善惡的關係少，而政治路線的正確與否的關係多。一個政治路線的錯誤，在已經成爲燎原之火的時候，自然一望而知；但千里之謬，往往由於毫厘之差，最初是非常微渺的。同時，

政治現狀變換無常，應付態度自然也因而異，在一個態度轉換之前，有時會落不出任何朕兆。比如汪精衛的「落水」，我們固然可以從他的「落水」以前的言行舉止中找出多少線索，但那線索恐怕很難在「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時候找出來。董卓既然「借賢者以動天下，蓋汲汲焉」，蔡邕不是算命先生，在被徵的時候，怎知他將來一定會變壞呢？宋雲彬先生說董卓是「跋扈軍閥」，這是蔡邕道「玷」的癥結。如果董卓不止於是一個跋扈軍閥，乾脆殺或廢了皇帝，自己稱孤道寡起來，而又能久享下去，歷史家自然會把他寫成德邁湯武，而使獻帝罪浮桀紂，平心而論，像漢獻帝那種人也未嘗不是像上海人說的「殺胚」；如果這樣，則董卓儼然創業垂統的君主，蔡邕也未必不是伊尹周公，我們現在恐怕要稱道之不暇了。再如董卓能夠「跋扈」到底，更厲害地壓制別人，更多地樹立黨羽，終其身不為別人所動搖，也不失為霞光一流人物。蔡邕也就沒有什麼白圭之玷。

秉性讓我們把野馬跑得更遠些吧：書上所寫的忠奸邪正，和當時的實人物

的忠奸那正，往往不一定完全一致——史書上所寫的好人，也許那本人不一定好，更不一定從頭到尾都好；所寫的壞人，也許本人不一定壞，更不一定從頭到尾都壞。史書上所寫的人，看起來似乎都是人性的問題，其實主要的却是政治路線乃至成敗利鈍的問題。只因一看錯，遂教滿盤皆輸，我在「歷史的奧秘」里曾舉出托洛斯基，汪精衛，因為細節太精，使人忘記了他在革命時期還有過若干勞績；反過來說，只因一看對，也可以遂教滿盤皆贏，力翠金生曾寫過一篇「張瑛梅」，一個專門屠殺青年的軍人，一旦患了民族英雄，就誰也不想靠他的舊賬了。而且史書的作用，主要的恐怕不在於紀實而在於說教。史書上的人物也和作品里的人物經過作者的概括與誇張一樣，也經過歷史家的概括與誇張。小說上的張飛、李逵、吉訶德、阿Q、都只是一種人物的典型，并不是實有的人物；史書上的董早、王莽、也只是一種典型人物，和真實的人是有差別的。不然，真實的人也像戲台上的紅臉白臉，一望而知，葵園、楊雄之流，都是知書識理，絕頂聰明的人，又豈肯輕易失足呢？我們今天說董早如何如何是容易的，說葵園如何如何也是容

易的，但在當時，董卓的面目，不見得有現在這樣鮮明；蔡邕的出處，也不一定像我們所說的這樣單簡。那麼，蔡邕乃至董卓，難道都是好人麼？我也毫無此意，只是以爲「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而「成王敗寇」之類又是歷史的慣例，尙論古人的時候，應該多替古人設身處地一點而已。

但這樣的意趣，完全不適用於對汪精衛和周作人。日本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這兩者之間，誰是誰非，誰正誰邪，尤其是一個中國人，應該選擇哪一條路，是昭然若揭的事。在周之流的倒行逆施，乃是知法犯法，明目張胆地自絕於中國人，與楊梅蔡邕當時情景絕不相同，不能混爲一談。宋雲彬先生說董卓「不是異族」，真乃一語破的的話。

一九四〇、一二、二七、桂林。

雲彬案：關於回淵明「歸去來辭」中的「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羨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我同意蕭今度先生的看法。淵明始以家貧親老，嘗爲州祭酒，後作以軍參軍（惟作那一個鎮軍將軍的參軍，有說是劉裕，有說是劉牢之。沒有考定。但我嘗詳查東晉鎮軍將軍的，自太

元五年——三〇八——到元興三年——四〇四——，有鄧楷、王蕚、王蒼、劉裕，而沒有劉牢之。以年歲推算，淵明似乎曾在劉裕那裏做過參軍），建威參軍（陶集有「乙巳歲三月爲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詩，乙巳爲晉安帝義熙五年——四〇五——那時劉敬宣爲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潯陽），又在桓玄那裏做過官（我會根據陶集中「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詩，認定淵明曾在桓玄那裏做過官，（我會根據陶集中「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詩，認定淵明曾在桓玄那裏做過官，因爲辛丑歲是晉安帝隆安五年——四〇一——，時桓玄正做荊州刺史也）。他補彭澤令，在晉安帝義熙元年八月，就在那年冬天爲了不肯向鄉里小兒拆腰而賦「歸去來」的（歸去來辭序中寫明乙巳歲十一月）。淵明一生除「州祭酒」不算外，至少做過七八年官，做的又都是參軍之類，那時候荊州揚州兩系軍閥，連年混戰，荊州系軍閥桓玄失敗了，劉裕正一手掌握軍政大權。那些幫開文人，奔走依附於軍閥之下，一種應得患失的醜態，我們雖然生於千載之下

，還是想像得出的。陶淵明自然看不慣這些，所以他做官的時候，常常表示他的「飢凍雖切，遠已交病」的苦痛。他初作鎮軍參軍時便寫出「望雲慚高鳥，臨水愧游魚」的詩句；在桓玄那裏做官「赴假還江陵」時，又寫出「投冠旋舊墟，不為好爵榮，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的詩句；在做建威參軍奉命使都時，又寫出「終懷在歸舟，諒誠宜霜柏」的詩句。等到他丟掉彭澤令時，他已決意不再做官了。爲什麼呢？他說，「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飢凍雖切，遠已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愷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他當然早已看出了劉裕的野心，知晉祚之將移，眼看將來總有一批醜類事新主的貴人。他自己便決定做一個「不爲好爵榮，養真衡茅下」的平民，把自己的高風亮節，奉獻給人類社會。他寫的「羨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其意若曰：「讓你們那些趨炎附勢的去當時寵，我是不幹了！」

我書怪一般註古人詩文集的，常常喜歡牽強附會。說某詩是「刺某



笑也」，獨於陶淵明的詩文從沒有人這樣猜測過。其實陶集裏的諷刺詩文，仔細推考起來，倒也不少，最顯著的是義熙七年所作「與殷晉安別」一首（那時候劉裕的逆跡更昭著了，殷岳仁受到裕辟，移家東下）現在全鈔如下：

「遊好非久長，一遇遊殷勤。信宿飄清話，益復知爲親。去歲家南里，薄作少時鄰。負杖肆游從，淹留忘清晨。語默自殊勢，亦知當乖分。未謂事已及，興言在茲春。飄飄西來風，悠悠東去雲。山川千里外，言笑難爲因。良才不隱世，江湖多賤貧。脫有經過便，念來存故人。」

就括詩中意思，便是說，「我移居南里，和你做了短時間的鄰居（注意！鄰居，非朋友，更非同志也），朝夕過從，非常高興，然而語默之間，我就覺得我們的旨趣不同，遲早要分離的，但想不到這樣快。像你這樣的良才，當然不甘做隱士，宜乎江湖之上只到些賤賤之士了。將來倘有經過之便，希望你來望望老朋友！」此外如飄飄肩輿之的，有「示周續之祖

金謝其夷三郎」詩；而「述酒」一篇，對於當時的朝政更有極辛辣而又極沈痛的諷刺。誰說陶淵明是田園詩人，不關心時政；誰說陶淵明溫柔敦厚，不咸否人物，那就不懂得陶淵明。

我不知爲什麼，這幾年來對於陶淵明愈加愛好，這當然是「與抗戰無關」的。但我對於另一位古人，近幾年來愈加厭惡，那就是「不爲危言巖論」的郭林宗。我愛陶淵明的「真」，就愈加厭惡郭林宗的「僞」。說起來話長，就此帶住罷。

## 時間的啓示

杜甫詩：「同學少年多不賤」，初讀的時候，不懂得是什麼意思。我沒有進過任何正式學校，所進過的學校，都是應該加引號——「」的。但就是一些應該加引號的學校吧，也使我有了許多同學。俗話說：「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轉

眼之間，完全脫離「學校」生活，已經十五年了。那些同學，以十多年的努力，很多人已經致身通顯，名聞中國，自有汽車洋房，護衛保鏢，而且門禁森嚴，要想會他，都不容易遞進片子去。在吃得飽飽，穿得緩緩的時候，倒也無所謂，無奈只會拿起一隻菸筆，寫點無聊文章的人，佷短就是個經常的問題。於是不免有時候由自己的飢寒想到同學們的榮貴，又由同學們的騰達飛黃，想到自己的沒有出息。說是各有千秋吧，不免有些中懷耿耿，說是富貴於我如浮雲吧，仍不免有些中懷耿耿。這才想到，「同學少年多不賤」這句詩，大概有些牢騷什麼的，不用說，志在伊稷的杜甫的牢騷，和心懷干祿，因為無才無智而終不可得的區區我輩的牢騷，絕對不會是一回事。

且說，那些叛逆的同學中有一個，對我，用舊式的說法，應該叫做知己的。如何知己，姑且不談，總之，很好就是了。有一年，我在上海實在窮極無聊，大有天上無路，入地無門之概。忽然異想天開，打一個電報到四川去問他：「我可以來麼？」那時候，他在四川兼任幾種重要任務，回電說可以。我就搗扯了一篇

旅費，溯江而上，到四川去找他。會着他在成都，好幾年不見，一見，彼此都很快樂，他馬上和我到館子里去吃飯，并且喝了一點酒。以前，我們常常在一塊兒喝酒的。我從來不諱言我是個書獃子，但書獃子往往有很多的奇獃子意見。這回，不遠千里而來，固然主要的是爲肚皮，難道不多少也爲了一點可憐的「懷抱」麼？這就是說我本準備了一些話要對他說。剛剛見面，又正在茶樓酒館，當然不是說話的機會，所以我們的話都只在別情離緒上兜圈子。他是聰明人，怎會不覺得，在吃完飯之後，就握着我的手：「晚上再詳談；現在我要到××部去。你就到我家裏去住，我可以早點回家。」接着他對他的隨從說：「××副官，你招呼×先生到家里去。」他自己上汽車走了。

半夜十二點鐘，成都的全城恐怕都早已安睡了。我獨自坐在他的客房里，看一本我最看不懂的外國文書，那房子的字畫，我都端詳過了，×副官，×參謀乃至×班長，也都彼此時時請教過，他們和我閒扯了一陣，就一個個溜去睡了。深巷里是靜寂的，只有時聽到門衛換班時的口令與動作的聲音。我從重慶坐了兩天的

軍用卡車才到此地，車上的搖盪碰撞以及路上的早起遲睡，都是使人困倦的，然而既然約好，就不能打起精神，等他回來。他回來的時候是兩點鐘，他進來之後，和我坐在駢排的兩張沙發上，當中隔着一個茶几。他問了一回關於我的住宿的事，申述了一回遲回的原因，我們彼此又都說了一些不相干的話。

「我這回來……」我說，我想這時候可以對他說點什麼了，「我想說……」

「報告！」外面一個聲音。

「進來，」他說。

進來的是X副官，他送來一大堆名片。都是他不在家的時候，人家來訪謁過的。他一張張名片看，口里問一些熟人留下些什麼話沒有，生人是什麼樣子，什麼服裝，要見他有什麼事等等。

「唔唔那麼……」他對我說，在X副官走了之後，「X，到櫃上把我的搖鞋拿下來，」他一面脫鞋子。

「我想說，我對於目前的……」

「報告！」

遞回進來的是X參謀送來的是文件和信札。他一面看，X參謀遞一面報告。某些公事辦理的情形。一面看，一面聽。一面讓勤務替他換那隻還未脫掉的皮鞋。之後，他又一件件詢問。一件件指示，一件件解說。我只好緘默着。

X參謀走了，保鏢又進來了，問還有事情沒有。

「沒有事了，你可以去睡。哦哦，你叫汽車夫……好吧，明天再講。」

接着又來過一個家里的什麼人，還惹他生了一回氣，罵了半天人，最後還接了兩次電話。

好容易都弄好了，正好談話了，但是他看看，已經三點過五分。

「實在對不起！」他說，「我困了。我早上六點鐘就起來了，一直沒有睡，沒有一晚睡過好覺的。明天早晨談，明天早晨一定。」

還有什麼話說呢？

睡了一覺醒來，天已經亮了。我連忙起來，問什麼時候了，X長起來了沒有

招呼我的人說還只五點半，他還在樓上。嗽口的時候，偶然向房門外面一望，房門外面是一個大客廳，把我駭了一跳，上上下下，坐滿了一客廳的客，都是有事情找他的。不多久，他下來了，向滿廳的人點了頭，坐在當中，面向着一個人談了一陣，大概一個什麼問題解決了，於是那個人告辭，他送。轉來，向另外一個人談了一陣，又解決了一個問題，客人告辭，他送。大概談到第七八個人吧，就有四五次電話催他出去。他只得向客人道歉，重約時間，同時也和我打了招呼，汽笛一鳴，他走了。一直到半夜一點多鐘才回來。

以下，不必細說，總之，他一清早就起來，半夜還沒有睡，他的事多，找他的人多，天天如此。我在他家里住了五天，天天見面，中間還同吃過一頓午飯，但是沒有半點鐘會讓我們從容談話過。回想起從前在南京的時候，有些夜晚，我們既醉以酒，既他以談，他踏着月色從三道高井送我回丁家橋；我又踏着月色從丁家橋回送他到三道高井，這樣張郎送李郎地月走且談的情形，簡直如同隔世，且而恐怕永久不會再有了。

就在那唯一的同吃午飯的時間中，他忽然問我覺得他有什麼進步沒有。我說，對於問題的處理，事變的應付，總會有些進步的，但那要委與生活的人才該得讀。

「那麼思想方面呢？」他問。

這方面的材料自然也同樣缺乏，幸而剛從報上讀過他一篇演詞，於是我說：

「我是向來不敢苟同 D 先生的理論的，從你的演詞看來，却似乎更接近他了。」

「唉，我讀書的時間太缺乏，簡直沒有辦法。你留在這里專門看書，看了對我講。」

「問題不光在書本子上。就是書本子吧，也一定要通過自己的眼和腦，要親自經歷那逐漸理解的甘苦過程。別人講的，就像咀嚼過的飯，無味，不滋養，說不定唾沫里還有病菌。而且，照這幾天的情形看來，你連聽話的時間也不一定有。」

這事情過去已經幾年，我却沒有什麼時候忘記過它。因為，我曾從這中間得



到許多關於政治的啓示。比如說吧，像我的同學，至少，在那時的四川，勉強可以說是要人了。爲甚麼稱爲要人呢？就因爲有許多種「要」和他發生關係。許多人要會他，連我自己也在內；許多人要他給飯吃，連我自己也在內；許多的公文信件要他簽字，許多事情要他處理，許多地方要他開會，講話，宴會……人只一個，各方面都要，這就叫做要人。要人一稱閩人，閩者寬也，一弊之轉。比如三等火車裏，一條椅子，普通人可以坐兩個甚至三個，但如果殷秀岑之流先坐在一條椅子上，你就不想到他旁邊受罪去了。因爲他寬，他一坐，剩下的空地，實在有限得很。一個人只坐兩三個人的位子還不算頂寬，頂寬的人，一個就得坐一個車箱。這不是說他真正寬得像十個百個殷秀岑那樣，只是說他需要那樣的位子，佔的地方寬。一個人只有一個座位，他就會死心塌地地坐在那個地方，惟恐失掉，再不會有。如果座位多，反而這裏坐坐，那裏坐坐，不知坐哪一個好。何況那些座位，沒有一個不是必需他去坐坐的？人就只好勞碌了。閩人，有些地方，又稱猛人，大概是威猛有力的意思。生或死，榮或辱，這樣或那樣。一句話，幾個

字，就是法律；就是鐵案，多麼威猛有力。但這威猛有力，恐怕是因為他說得少的原故。爲什麼說得少呢？自然是這個要他說，那個也要他說，這裏要他坐那裏也要他坐，他沒有工夫在一個地方，對一個人或一件事說得更多。有一篇小說，題名「一個忙經紀人的戀愛史」，內容是說一個美國銀行經理在百忙中被女打字員身上發出的香氣所刺激，忽然想起自己本來許久就愛上了她，不過因爲忙，沒有機會表示，於是馬上下決心，單刀直入地向她求婚。誰知那女打字員被他的話嚇昏了，過了半天才說：「親愛的，我們昨晚不是已經結過婚了麼？」這自然是個笑話吧，但人忙起來，真會到如此可怕的程度，這是我目親過的。猛人的猛字本來是孟浪的孟字，音也近於夢寐的夢，懵懂的懵，朦朧的朦，恐怕猛人這名詞，也本來含有這樣的意思。孟浪乃至朦朧，都似乎與腦筋，思考有關，猛人既然事多人忙，靜心思考的時候當然很少，說不定會真有孟浪乃至朦朧之處。匹夫匹婦如我輩者，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所事又屬雞零狗碎之類，縱不思考，縱鑄大錯，所關不過一身一家的得失榮辱，真是「何足道哉，何足道哉」；至於猛人即國

人亦即要人所作所爲，都是天下國家的事情，都是歷史進退的事情，何止數千萬人的生命財產，吉凶禍福？生或死，榮或辱，這樣或那樣，如果像我輩吸大毒牌或富強牌，喝清茶或白水，這樣隨隨便便，不加深思，那危險就可以是無窮的。即使他們人人都是天才。

我們目前的政治，是在竭盡一切力量地進步着；依我的理解，說不定還是從古所沒有的昌明（我不大相信三代郵治之類的話）。但進步是無止境的，昌明是無限度的。也正因爲進步，昌明，才使人民的目光更敏銳，要求更高，覺得比起抗建形勢所需要的，還似乎有多少距離。政治是人的努力的表現，要政治進步，必須從事政治活動的人進步；要從事政治活動的人進步，至少在思想方面，必需他有思考的餘裕。蕭伯納說，人要常常用腦筋，他每星期用一次，就成了世界聞名的人。我以爲從事政治活動的人，尤其是那些有力者，更應該時常用腦筋，因爲在一切人類活動中，政治活動居於主導地位，政治的進步，比之於別方面的進步，給與人民的福利更大，更直接。可惜他們「忙經紀人」似的生活，却妨害他

們作這一件最緊要的事。

一九四一、二、桂林。

### 失掉南京得到無窮

上海抗戰開始後四個月，我們底首都南京失陷在日寇手裏了。那時候被困在南京的部隊聽說有多少師，人數有多少萬，在寇軍底飛機大砲底追擊之下，倉皇退却，棄路而走，所謂「兵退如山倒」，不說直接死于敵人大砲火，就是自相踐踏而死的戰士聽說也要用千，甚至用萬來計算。我想南京的市街，那時候一定成了血的長江，血的大海，無論甚麼人或自己底戰士，活過來的，恐怕都免不了有一雙紅的腳和腫了。敵人自然是喊殺連天，聲威百倍；就是我們底奉令撤退的大軍，料想也有悲壯的呼號和怒吼，如果這樣，那聲音恐怕會遮沒了飛機炸彈底聲音，吞蝕了大砲和步槍底聲音，一句話，人底聲音壓倒了一切的聲音。有人不知

這帝國主義國怎樣屠殺弱小民族的人民麼？不知道日本法西可蒂底瘋狂到了怎樣的程度麼？請到我們中國來，在這里，南京底失守，已經不是第一次的大血戰，大概也不會是最後一次的。哦！多麼大的一筆血債呀！

然而我們底損失還不僅這些。那從異族手里奪回了漢家天下的朱洪武底墓上，那推翻了愛親覺羅氏底統治，一生里高喊打倒帝國主義的孫中山先生底墓上，如今，聖潔的貞女被淫污了似地，有了侵略底腳印了，十年來政府底建築（這里通常用「建設」）：大學，研究院，圖書館，一切文化事業上的設備；軍械庫，飛機場，汽油汽車底堆棧，無線電台，一切軍事或交通上的設備，都被敵人或自己燒成灰燼了！豪商，小市民，公務員們底產業，貧民的底草棚，種田的，種菜的人們底田莊或菜園一定也給澈底地破壞了，多少逃出了的人民失了業，失了家，離開了家人父子，在百里之外，千里之外，遙遙地望着那龍蟠虎踞的石頭城，從自己底產業，自己底辛勤的成果上發出來的煙火而悲傷歎息！

南京是我第二故鄉，我在南京足足住了五年之久。初到南京的時候，城內還

沒有一條寬闊平坦的馬路，街面上盡是破舊低矮的瓦屋，從北門橋到唱經樓那一條又窄又短的小街，在那時候還是南北交通的「道」，汽車，馬車，人力車，和步行的人們，每天都擠得水洩不通，每天都會有幾件為了擁擠而發生的爭吵，撞傷而至撞死人的事。至於路邊的建築，更是什麼都沒有，古拙的鼓樓算是這城里唯一的壯觀。一年兩年，五年十年，南京完全改變了面目，有了全國最好的柏油路，有了富麗雄偉的會堂，官廳，學校，戲院，商號，飯店，菜館，咖啡店乃至私人住宅，不說別的，只說那荒涼空寂的玄武湖，在最近一兩年去的時候，都幾乎認不出是什麼地方了。南京，猛進中的南京，繁榮的南京，如今，全被日寇底砲火燬得干干淨淨了！

然而南京底失守，對於全面抗戰決不算是嚴重的打擊，剛剛相反，在無意中倒給予抗戰一種莫大的幫助。何以見得呢？這里讓我講一個故事。

有一個朋友是和我同時到南京的，也和我一樣是個窮光蛋，憑着一張政政什麼學校的畢業證書特地到新的首都來找職業。我覺得他是誠樸，豪爽而又熱情的

青年，在那時候，像那樣的青年，要找個小小的位置還不很困難，似乎沒有多費力，就到某機關辦公去了。薪資很微薄，他底生活也很簡單，他一面做事，一面很努力讀書，年紀青，離開學校不久，對於所學的東西有着不小的自信力，常常表示，只要職業能夠保存，只要不至于真正餓飯，對於法學總要繼續研究下去，三年兩載，總會把研究的心得發表一點出來，一句話，很有點想成爲一個法學家的野心。他不但留心書本子，還留心各種各樣的問題，像醫生看社會上人們底生活，許多都不合乎衛生，許多人底行動都是病態表現一樣，在這位未來的法學家底眼睛里，就到處都是無法非法玩法遶法的現象。前面說過，他是個熱情的青年，無論什麼，一聽爲不滿，就表出極端的憤慨，一點也不含蓄。然而這種態度，和他底生活環境并不適宜，爲了這我也曾費過不少勸慰的唇舌，甚至于促他聽我爲富于妥協性的分子，終于不大和我來往。五年以後，我離開了南京，似乎不到一年，忽然聽說他不知由于怎樣的因緣，平地一聲雷似地做了某某部的司長了。在社會上混了好些年，人多少變得非淺些了，雖說知道他所學的東西和所担任職

務沒有絲毫關係，也並沒有覺得稀奇；只是想像他那樣的青年，既然佔得相當高的地位，總會多少認真做點事吧。但是等我再會見他的時候，他已變成了汽車陪級，有一個極其摩登的太太，人發了胖，臉上添了不少的紅潤，那樣子幾乎比從前還要年青些。這自然都不足為奇，奇怪的是他，和我談了大半天的話簡直沒有對于任何事情表示不滿。從前那種憤慨的詞色，似乎完全絕了跡。

南京的官員們，不，公務員們，有一個共同的嗜好，喜歡買地皮蓋房子，舊的南京，本來很少或者說簡直沒有適當的住宅，連那舊式的不適當的住宅，因為人口增加，房租也被抬高得教人難以相信的程度。于是和機關衙門一齊，公務員們只要怎樣能弄幾個錢就把錢拿來蓋房子。由于那些公務員們底努力，南京就有了許許多多的什麼里什麼坊什麼村和許多單家獨院的嶄新的洋房子。每月只有百十塊錢的薪水的都有人住着自己底新的住宅，甚至于房子租給別人。大概他們除了節儉之外，還有我們不懂得的辦法。

這位朋友既然已經是汽車陪級，蓋房子的能力當然比許多人要充分得多，這



時候他已經在某某部背後造起了一座相當宏敞的樓房了。我正是在他底府上會見他的，大門以內，正房四旁，是一片青蔥的草地，有各種各樣的花木，房子底某一邊旁邊空架着不少的鴿子籠，成羣的鴿子在邊旁飛舞，他告訴我許多種鴿子底名字，出產的地方，購買的價格，以及烹調出來的滋味，他對於鴿子底知識，似乎超過了他底法學的知識，至少是更有興趣些。那園裏的動物，并不只鴿子，還有猴子，兔子，小狗，小貓之類，沒有事的時候，他就很高興地和那些小動物們玩耍。

這房子底樓下有一間寬大的客廳。牆上糊着不知是什麼圖案的花紙；玻璃窗上糊着弄不出一顆灰塵，淺碧色的細絨的窗簾使光綫變得比較陰暗，雖然天氣已經很熱，但在屋子裏，縱然沒有那天花板下的電扇不停地轉動，也正像休息在大菩提樹底下一樣涼爽。西洋油畫，都錦生彩色織錦，宋徽宗仇十洲以及幾個當代名人底書畫，掛在壁上；我不能辨認的什麼瓷瓶，瓷羅漢，金屬的小小的工藝品之類擺在紅木案上；收音機，鋼琴，書櫥，沙發茶几……都原樣在好像由各自

選擇的一個最適合于自己的位置上，并且各各有一點點糊糊的倒影，被攝進那光亮的地板里；那地板，除了我剛才踏上的灰土的印象以外，沒有一處有半點不應該有的痕跡。

我那時候的心情已經記不很清楚了。對於核棘在自己眼前的陳設，大概有些羨慕的吧。然而那完全是個陌生的地方，我面前的主人也完全是個陌生的人！我想，這位華貴的私邸里的老爺，不，公務員，就是七八年前的我所熟識的那位窮光蛋麼？就是那立志要做個法學家的法政學生麼？就是那對於這也不滿，那也不滿，成天在憤慨里討生活的熱情的青年麼？我把周遭的環境打量了一下，又把他從上到下，從下到上打量了一下，發見他和從前那一位，簡直沒有絲毫相同的地方。啊！一個人的變化是太大了！

我和這位朋友是從小在一塊兒長大的，他家里的景況，我知道得清清楚楚，這房子和房子里的一切自然不是他家里原有的東西，却也決不是現在做了官特爲從家里拿一筆錢來造房子抹門面的，他家里根本就沒有錢，不言而喻，都是做了

這青年社麼漢的義務似守難我，一半開玩笑，一半也是真實地說。

「這學界不歸政府管，如個人在這行這又豈是零裏里的道點東西，如果是誰放那說該使多管人豈不進去罰法？」

「真真說得他有點越呢却又很正經似地說，『這算什麼呢？這是一種腐化的生活呀！』」

「真的麼？」我底反問是一種欣悅的表示，我想，他既然知道這一點，總該有把自己拯救出來的可能，我很希望他能夠真正自覺。可是這意思很難找出適當的話來傳達，口里只是離題萬里似地說：「你近來對於法學自然格外進步了？」

「哪裏哪裏，我的法學知識本來很淺，又丟了幾年，早已擱頭不是腦了。年紀一天大一天，記憶和頓悟的能力也不比從前，做了官，要辦公，要應酬，要幫親友朋友想法子，在這稱生活運轉，還談什麼呢？」

「你不是嫌這生活腐化麼？我相信這腐化只是表面，你個人一定還有不腐化的私生活。」

「沒有，慚愧得很，真正沒有。我只是覺得這種生活不盡，有時候還真想擺脫，不過，有什麼法子呢？我有父親，母親，丈人，丈母，弟弟，妹妹，老婆，兒子，我不過這種生活，這一家家人就沒有飯吃。中國這社會，真不叫玩意兒，把不知多少人底生活負擔，壓在很少的幾個人頭上。那些把自己底負擔壓在別人頭上的人們，除了虛榮；除了物質慾望，什麼也沒有，什麼也不懂得，並不說他們有意地這樣幹，可是事實上却真像擺下了株仙陣萬仙陣一樣，向你包圍，不斷整色地逼你向墮落的路走上走，朋友，我不是聖賢，也不是豪傑，對於自己底周圍，看不十分清楚，所以不知不覺上了他們底當，而且現在縱然覺察了一點，却已經騎虎不能下虎了！你想像我這樣的人在南京，倘使要多少有多少，除了做官，還能做什麼呢？」句老話：「文不能當糜餘生，武不能當担架兵」，只有還是做自己底官，做得一天算兩個半天，自己咀嚼着自己底靈魂過日子！這自然只是我現在的心境；至于不久的過去却比現在更為麻木，成天在設法打洞找升官，找兼差，找幾點不義之財的機會。你瞧，這房子這一切，你以為是靠規規矩矩的薪

水換來的麼？一個月幾百塊錢夠什麼用呢？不過，那不消談的，反正你也不一定懂。聽說你在南京過過幾年，政治舞臺上的黑暗，官僚們的貪污和卑鄙，那情形你未必真正看見了什麼。」

他臉上表露出來的苦悶，證明他底話有相當真誠，可是仍然不知對他說什麼的好。于是我撇開他個人，就一般的情形說說。我說，國家的現勢，可說是危亡無日，日本強盜隨時都準備併吞中國；中國的政治機構如果不改革，政治舞臺上的人們如果還不覺悟，一定無法抵抗，怎麼這一般官老爺們還在爲個人爲家庭打算呢？

「對呀」，他說，「中國的政治這樣腐敗，決不能抵禦外侮，不是老早就有這們一句話麼？」中國不亡是無天理，「你說這話在那些官僚們中間引起了怎樣的反應？他們說，趁現在還未亡國的時候，多做幾天官，多弄幾個錢，多舒服幾天，日本人一來，就什麼都完了。」

這也許是個很高明的見解，可是也是個無藥可醫的痼疾；我想說日本人一來

，就什麼都完了。也未見得。日本人來了，也需要中國人做官，并且正需要這樣  
的官。不過這話不能告訴他們，一告訴，他們就更無忌憚了，所以當時對那位朋  
友也什麼都沒有說。

和這位朋友一別又是幾年，最近偶然碰到一個故鄉人告訴我，是他死了。起  
初我還以為是日寇轟炸南京的時候被炸死的，那位同鄉說不是，上海抗戰發生  
後一個星期，他就請了兩個月的假，送家眷回鄉里，不知怎麼，在鄉下生了病，  
假期滿了還不能去銷假，於是撤了差；近來寇機無情地轟炸南京，南京不知受了  
多大的損失，他底房子好像也被炸燬了。走的時候仗打得還好，他沒有想到會這  
樣的，所以回鄉也并打算搬家，聽說房子裡有些值錢的東西，他也有病，又丟  
了官，丟了房子和一切東西，正是火上添油，病上加病，在補京失守以前就死  
了。

對。劉大統他死的原委是這樣，這證以從前他對我談的藍田至少死味的心理還深  
雜一點，不過我聽藍田所談原委是極其難的房產，這原委是極其難的，原委是極其難的。

一定壞了；名貴的書畫古董，收音機，汽艇之類自然也都壞了。極調適，在南京像他那樣的人，要多少，有多少。那末，那些什麼坊，什麼舖，什麼窩的人，大大小小的貴人公子們不是也受了和他一樣的遭遇呢？雖然不完全一樣，但該都分地一樣吧；那末，他們要在亡國之前，多享受些舒服的企圖，現在怎樣了呢？爲了生活的負擔，爲了供應父母妻子親戚朋友而不能不貪污卑鄙的辨解又怎樣呢？

不錯，南京是中國的首都，然而腐化的首都，不足以領導全國抗戰的首都，像我底朋友那樣的人們底房產底存在就是鐵證！現在這首都失陷了，不用說，爲了保衛它而犧牲了的戰士，是應該哀悼的，文化機關教育機關，可以剿滅日寇的軍火儲藏機關，以及居民們底室家底被摧毀，值得惋惜的；朱洪武孫中山底墾地底被淫污，是應該引爲恥辱的；日寇底暴行是可憎恨的！然而只是如斯而已，其它的什麼建築之類，自然也是中國人底智力體力財力；中國老百姓底血汗底成要吧，可是都是於國計民生沒有什麼補益的東西！讓那些秦淮河邊的歌台舞榭去

吧，讓那些飯店，咖啡館，影戲院……去罷，讓那什麼院什麼部的衙門，什麼禮堂會場之類去罷，讓那些達官貴人們底邸宅和那里頭的秦磚漢瓦，巴黎香水，紐約鸚花符之類去罷，在這抗戰期間，那些都是無用的廢物！

魯迅先生有一句詩：「金風蕭索走千官」，現在這般「走」着的「千官」們，回想起在南京的高樓大廈及一切，是不是像做了一場春夢呢？如果是，現在是覺醒的時候了！澈頭澈尾地懺悔吧，革面洗心地改過吧，誠心誠意地感謝抗戰把你們從腐爛生活中拯救出來了吧！能夠這樣，沒有了南京那腐化的首都，無論在什麼地方都可以建立起一個堅強的能夠抗戰到底的新首都來；能夠這樣，我們一定可以收回南京和每一寸失去了的土地。

南京是失陷了，然而官老爺們底腐化生活的惡習，貪污卑鄙的成績，也在被摧毀了，如果這能夠促成他們底覺醒，加強他們抗戰到底的決心，于民族解放運動的前途是有莫大的利益的。失掉的是南京，得到的將是無窮。

一九三七，一一，二〇，漢口。



## 莎士比亞應該後悔

在什麼地方看見一點「珍聞」：莎士比亞的簽字，現在可值五百萬美金。也許有人以為，文人不可為而為，莎翁像一個卑微的奴隸，伺候了王公大人們一生，但身後，畢竟連一個簽字也如是地貴重起來了；那些當年會被莎翁伺候過的王公大人們的遺寶，是不見也同等地值錢呢？嗟乎，若景公有馬千疋，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死於首陽之下，而使貧夫廉，富夫有立志。一個人誠然不能只看他當前的窮通，榮辱，尊卑，或貴賤的。

我不這樣想。我想莎翁如果死而有知，現在恐怕會後悔，後悔自己曾經寫過文章，並且簽過字。枉拋心力作劇人，真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無所用心地簽了幾個字，不料倒給不肯子孫，那些市儈們，那些古董商人們，造了一個發財的機會。「威尼斯的商人」，莎翁不是嘲罵過麼？而後世的不僅威尼斯一處的商

人，却在享受他的遺產，享受由他的精神遺產所能變換來的一切物質的遺產了。

世界上真有一種人，無論什麼事，無論什麼人，無論什麼東西，都是他們發財的工具。只要能發財，祖宗祖宗算什麼呢？妻室兒女算什麼呢？民族國家算什麼呢？於是現在蘇有所謂發財難財的。悲觀失望的人們搖頭嘆氣說：「國家將亡，必有妖孽」，這些妖孽們自己却說：「國家將亡，還是多搶幾個錢吧。」

最近，江西某報載：一鎮縣國民對日經濟絕交委會委員錢某，利用職權，在外開設賭，案發被捕，判處死刑，從犯譚吉人亦依法處徒刑十年，廣益昌商店違法行賄，藉圖私賣仇貨，罰款三萬元」。這是發財難財的一個小例。

這「小例」者，因為據說：受賄與行賄者之間，只有八百元的交易也。然而也因為只有八百元的交易，所以一邊被槍斃，一邊被罰款了的吧。假如他們有資格發大國難財：交易數目，動輒以萬億計，恐怕誰也不敢槍斃他，罰他，或者他反而要槍斃別人，罰別人了。莊生有言：「竊鉤者誅，竊國者諸侯」，此蓋振古如斯，不過如今為烈而已。

除了發國難財，另一生財大道是當漢奸。太漢奸在精衛之流，豈不必說一下。至張翼平也公然可以拿幾萬塊錢辦刊物（不知道那刊物上將說些什麼）。不過也不見得每個當漢奸的都有財可發吧。張翼平多麼向隅者自然在所難免。先望之後，怎麼辦呢？曰，不要緊，我們有的是寬大的政府。寬大的國民。當漢奸沒有油水，仍舊回來好了。張翼平一時的例子，也不是不曾有過。我們決不反對當漢奸的人。雖然來歸，剛剛相反，倒是希望他們全都革面洗心的。但希望他們回來之後，不找機會發國難財。發表一點文章也未嘗不可，也請少談點和平與什麼的區別之類的高論。其次，至少應該不罵人吧。陶希聖的蘇聯不提，周樂山，湯增歎的自新宣言，爲說他們的一去一來，是「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這詞是很滑稽的。當漢奸而是君子，豈不等於說不當漢奸的反而是小人麼！我是讀過幾句古書的。在古書上常常碰見君子長，君子短，却從來沒有想到所謂君子，竟是這樣一副臉嘴！

## 飛機的用途及其它

### 一 飛機的用途

報載：「X X武庫街口X X大飯店，有飛機運來地道來路貨西餐，每客五十元，小賬加一在外。」這是一條非常值得重視的消息。

我常常聽見說，X X生活程度很高，生存非常困難，所以我雖早想觀光，至今尚未成行。看了這條新聞之後，我就不相信那些鬼話了。那里生活程度也許很高，但生存一定非常容易。何以見得呢？從有人賣五十塊錢一客的西餐看出。有人賣，當然是有人吃，能吃五十塊錢一客的西餐，當然是賺了更多的錢。錢是人賺的，他是人，我也是人，他可以賺，我當然也可以賺。而且從「小賬加一在外」一點，尤足證明那里賺錢之易。夫「小賬」者，茶房之流所得者也，「加一」者，五塊也。茶房之流，伺候一客西餐，即得五塊；伺候十客即得五十塊，一天

倘候十客西餐，何等清閒自在，而五十塊國幣就進了口袋。茶房猶且日進半百國幣，像我這樣的人材——比之於茶房，老實不客氣地說，我總要算個人材，至少是編報屁股的人材，無論如何，作的事當然要比茶房重要一點，縱然不說收入一定會比他多，和他同等，也就可以了；縱然不同等，二分之一，三分之一，乃至五分之一，大概也行了吧，那麼，生存有何困難呢？

抗戰以來，我們無論什麼都進步了。這是用不着懷疑的。現在簡直連西餐館都自備飛機（是不是自備待考，縱然不是，其方便也當不下于自備）運西餐了。西餐館而自備或等於自備飛機，飛機而用之於運送西餐，則飛機之多，不問可知；日本小鬼，就沒有聽見說有這樣悶氣。光就這一件說，還有什麼敵寇是我們打不平的呢？抑又一說，飛機的最正當的用途，應該在於交通運輸，只有帝國主義強盜，才用來侵略別人，轟炸被侵略國的設防與不設防的城市。我們的飛機用在運送西餐上，正是使飛機的作用，返璞歸真，矯枉而毫不過直。用飛機運送東西，主要的自然是因為迅速，中國遼遼關的土地，有些東西也真非用飛機運送不行

。從前楊貴妃在西安要吃廣惠的荔枝，沒有辦法，只好難爲馬騾。荔枝以新鮮者爲貴，最好從樹上一摘下來就吃。從廣東到西安，無論馬跑得怎樣快，也得好些日子，荔枝的味，會受影響的，就算影響不大吧，而馳念於若干日之樹，嘗味於若干日之後，在這等待期間，也夠餓人的了。如果用飛機運，情形就會完全不同。楊貴妃不生在有飛機的現在，真是楊貴妃的不幸，她自作了一回貴妃了。

## 二 嚮往

有五十塊錢一客西餐的地方，我真想去。因爲西餐既賣到五十塊錢一客，當然其味無窮，吃了提神健腦，滋陰補陽，有意想不到之效力。

但那里的報載：那里的衛戍司令部正在「取締黨改軍機關人員宴會」，內面存一帳單中，餐每八兩元以上，西餐兩元五以上，皆在取締之列。而且不得買酒。據人言：並派有憲兵到各餐館「檢查」。

憑實說：我想到那里去吃那樣名貴的西餐，本來就打算帶幾個特級政軍機關人員的位。假如我以「盛大」的資格出現，就會一文錢的收派也沒有。

，用什麼資格吃西餐呢？可是當了「機關人員」，就不能吃那老實西餐了，不但有「特約」裏，而無緣吃好西餐的「機關人員」，當得也乏味。

「忽然想到」，「一二」者將兼行的辦法，前幾天報上說有人主張禁止公務人員兼營商業，是見是有公務人員兼營商業的了。公務人員，也就是「黨政軍機關人員」，我何不在當了機關人員之後，又兼營商業，上辦公廳的時候，我是機關人員，下了辦公廳，我是商人，商人就是「常人」，馬上就可以上西餐館了。

然而這里已經有人主張禁止了，說不定就要實行，如果那里的情形也一樣，又怎麼辦呢？不必操心，至少暫時避大有可為。我今天看見那里的報紙上有一段「徵婚」廣告，里面有這樣的話：

「某君……任公務員，兼營企業，月入約千元……」

是見「兼營企業」，并不被禁止，不但可吃名貴西餐，就是找配偶也非常容易，如見「花點廣告費」的話。

### 三 孤與兔

報載：一個「搶匪」爲了搶一家書店裏的自來水筆——據說並未搶到手，被判處死刑，褫奪公權全部終身，並且已經驗明正身，押赴刑場了。到桂林後，這是第一件使我有點兒感觸之類的東西的事情。

孔乙己先生曰：「偷書，算偷麼？讀書人的事……」（參看魯迅全集孔乙己篇），假如孔乙己先生的理論可以成立：偷書不算偷，是讀書人的事；那麼，搶自來水筆就不能算搶，因爲應該是作家的事。然而商君有言：「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法，只問偷不偷，搶不搶，不大肯管犯法的是不是讀書人，作家或者別的。孔乙己先生雖然是讀書人，大概還不很博，說不定簡直不知道歷史上還有商君其人；否則他的腿子也許不會被打斷了。至於那搶自來水筆的，既已明書爲「搶匪」，當然不是作家，既然是「搶匪」，即使從來沒有搶過，也應該判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之後，驗明正身，押赴刑場。我們的孔聖人，就這樣談過少正卯的。

或曰：是搶匪還是作家，不能這樣輕易斷定；要看所搶的自來水筆是什麼牌



子。是派克真空管筆，據說現在值得百來塊錢，足見他是個用筆的內行，至少差不多是一個作家，如果只是關勳銘之類，不過值得幾塊錢，不值一捨，不值一捨而公然捨，足見他有眼無珠，劫掠成性，是捨匪無疑。

幸而文獻不足徵，不知所捨的自來水筆，究竟是什麼牌子。若不幸而證明是派克真空管，那才真教人不寒而慄。因為我自己也忝為作家之一——請真正作家們大度一點，讓我在這里冒充作家之一吧，而如今生活程度如斯之高，文章如斯之不值錢，自來水筆又如斯之可愛，難保當徘徊於書店文具店的玻璃櫃時的時候，不會心動而手癢。語有之：「免死孤悲，物矣其類」，所以我也就有一點點感觸什麼的了。

一九四〇、五、一四。

## 汽油——藝術

一：從汽油節約說到張恨水

近來，桂林市上有一種勤儉節約汽油的運動，成績如何，不得而知。但我却因此想起張恨水君在其近作「八十一夢」的「天堂之遊」中有關汽油節約的一段話：

流淚型的汽車，如穿梭一般的走着……一輛跟着一輛跑，就像一條長龍橫在地面上跑。……只見廣場中間，樹立着一座大鐵架，高約十丈。在鐵架中間，懸着鐵絲架的天字，漆上紅漆。那字由上至下，共是八個，乃是「一滴汽油一滴血」。我凝視這神傷人爽處。這一滴汽油一滴血的口號，他們簡直說明，這是大民脂膏。……諸君戒道：你不要信街上貼的那些標語，我坐我自己的車子，燒我自己的汽油，干別人屁事……

如果天上的情形也不過如此，地上的事情，恐怕更難說了。

張恨水君以「春明外史」為一噱笑煙絲，兩書之擁有廣大的讀者，他的書的銷路之多，恐怕都趕不上「巴金張賽平」都比不上。而他的讀者也未必是別太爭取得江的。但不像得過二十年以來的「賽平」竟想讀完一冊他的書，無從通兩頁也還不

手法，總覺得他在說些孤獨的鬼話似的。

最近，忽然翻開舊地報紙，看見他的八十一夢，懷着「若此公現在在寫些什麼」的心情，看了未完的天堂之遊，你竟竟爲吸引。八十一夢，只是一種遊戲筆墨，重影射，多譴責，浮光掠影，冷嘲熱罵，不脫「官場」「現狀」窠臼。雖然比起啼笑相繼來，實在少了許多鬼話。

但我覺得與其看清客們寫的老板印像記之類的文章，不如看「天堂之遊」。不但沒有故意作偽的痕迹，有時候還覺得言之有物，痛快淋漓的，比如其中子路罵毛頭星孔明一段：

牲口！我夫子聖門，中華盛族，人人志士，個個君子，以仁義爲性命，視錢財如糞土，萬姓景仰。你也敢說聖裔兩字？你冒充姓孔其罪一。直犯諸葛武侯之名，其罪二，在孔氏門徒面前，大言不慚，自稱義士，你還我師徒於何地！其罪三。

好久以來，文壇上，就隱着「利用舊形式」，理論家們無不說得頭頭是道，

振振有詞，成績却不見得比勸節約汽油有何高明之處。爲什麼呢？能夠把握新內容的人，往往不能駕馭舊形式；能夠駕馭舊形式的人，又往往擺不脫舊內容的影嚮，光要新內容套就舊形式，不解舊形式來迎合新內容，當然用力多而成功少的。張恨水君是現在能駕馭舊形式的少數人中間的一個，從他的作品，也還能看出逐漸演變的痕跡。百尺竿頭，進步正未可量。但和舊形式不是很容易駕馭的一樣，新內容更不易把握得住的。我們一面希望張君自己的努力，一面也希望讀者利用舊形式的人，不要忘掉了他。

## 二、從張恨水說到墨子

張恨水君的「天堂之遊」，曾經提到過墨子，也無非說墨子一生處心救世，而貧居鬧市無人問，人們却正忙於歡迎有錢的四海龍王之類。只是我倒回頭來聽聽那些勸人節約汽油的先生們，似乎也有一點兒墨子似的靈動兒似的。

墨子一聽說楚國要接蔣宋國，就一面派他的學生們，幫助宋國防守，一面自己就走到楚國去見楚王，要楚王不去侵略。事不干己，而勞碌奔波，唇舌焦敝，

精神是偉大的。

勸人節約汽油，自然比勸人不侵略別國，事情要小得多。然而，藉八戒先生曰：「我燒我的汽油，干別人屁事！」別人看起來，也真是他燒他的汽油，干我屁事。而有些先生們，也勞碌奔波，唇焦舌敝，可謂小具墨子風度。

勸人節約汽油，就是勸人少坐汽車。我也不大高興人坐汽車（公共車運輸車之類除外），但不是爲了節約汽油，汽油如果應該節約，應該嚴密地統制，政府真有決心，不見得沒有辦法；「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真是干我屁事。我所看眼的比較迅速，是關於社會教育方面。我曾經說過這樣的話：「一向不佩服一種升公務員發洋錢的思想，以及由那思想表現出的種種行爲，對那樣的思想與行爲，（坐汽車的）關人們的風頭十足和關人的夫人小姐們的冶容招搖，是有着巨大的誘導作用的。」（據作「在汽車上」）。人一關，因公當然坐汽車，上餐館，上戲院，乃至上胡同也坐汽車；不但自己坐，眷屬也坐；不但眷屬；親朋也坐；不但親朋，娘姨奶媽聽差之流也有時坐；更不但娘姨奶媽聽差之流，小狗小貓如果

主人要帶牠們出門的話，也無不可坐。汽車而至於小狗小猫也無不可坐，就難怪野心的徒步者會發生「大丈夫不帶如是乎？」之類的感想了。所以說，對於升公務員發洋錢的思想與行爲，有着巨大的誘導作用。但這自然只指還只有很少的人能坐汽車的今天的情形而言。

雖然不大高興人坐汽車，但至今還沒有勸過一個人不坐。我似乎沒有絲毫墨子精神，所以對那些勸人節約汽油的先生們，也就覺得有點慚愧。

但勸人節約汽油，是怎樣在勸呢？如果到那些有汽車的人們府上去勸，在路上攔住汽車勸，勸不好，採用有效辦法更勸，那是真正老牌墨子精神；因為墨子直接勸過楚王。如果只是在這兒那兒，對那些沒有聞過汽油氣味，也沒有夢見過坐汽車的人們，灌輸一套「汽油節約論」，對於真正坐汽車的人，至多不過取瑟而歌，使之聞之；雖然仍舊難能可貴，但和真正的墨子精神，似乎不能說沒有多少距離。

### 三、從墨子說到藝術什麼的

墨子的精神雖大可佩服；墨子的思想，却不一定可以全盤接受。「今天」「明鬼」，不脫巫術的本來面目（墨學淵源巫史，且墨本非姓，與儒同名法同為學派泛稱，墨與巫，為輕重解，古音蓋同，古人複姓，有澹台，亦有巫馬，蓋均雙聲；今稱馬來亞，亦曰巫來由。巫音近馬，馬音近墨，故墨或卽巫之或體字）且不必談；「非樂」一說，對音樂、戲劇、繪畫、跳舞、雕刻、建築等等藝術一齊反對，器量是很狹隘的。

自然墨子反對藝術。主要的是藝術都被特權者拿去享樂去了，但因為特權者享樂，就反對藝術本身，究竟是因嗜廢食。孟子就比較漂亮，「王請勿好小色」，「王請勿好小貨」，深得因勢利導之旨。故荀子說：「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解蔽篇），「墨子之非樂也，則使天下亂」（富國篇）。

然而墨子的「非樂」見解，一直到現在還存在於許多狹隘的實用主義者的腦經裏。「文學不死，大盜不止」，早聽見過了；抗戰以來，更有人以為國難期間，還演什麼戲，唱什麼歌，畫什麼畫呢？熱心青年問題的指導者們，又在以身作

則，苦口婆心地勸人莫讀文學書。

不錯，象牙塔里的藝術，也就是專供特權者享樂的藝術，我們是要反對的。但對於另外一種藝術，爲人民所需要所享受而能啓迪人民推動人民，煽起潛伏在人民中間的抗戰的火焰的藝術，却應該提倡。如果抗戰不是四萬五千萬人都必需同時拿起槍朝敵人射擊的意思，至少，暫時之間，有人演演戲，唱唱歌，畫畫畫，寫寫文章，只要那戲，那歌，那畫，那文章是有助於抗戰的，或者更博大點說，無害於抗戰的，似乎並不就等於逃避兵役或者浪費了軍用必需品的汽油。等到必需每個人都衝鋒陷陣的時候，再叫他們去拿槍，也不算太遲，那些正在非難藝術的先生們，豈不是今天也還沒有拿着槍麼？

「灘江雜集」的小啓說：「藝術爲人類文化最高之表現，亦爲人類生活最高之享受……時代興衰，有關藝事；國家隆替，總繫人文」，正說明着藝術的作用。抗戰以來，戲劇，音樂，繪畫，文學，這些藝術所盡的推動作用，有目共觀；叫藝術家們離開崗位來參加抗戰，不如讓他們不離開崗位來參加抗戰，得到的



實用更大；但這似乎不足以鑿於狹隘的墨學者們，更不足以語於一面自己吟風弄月，玩着消閒游賞的「藝術」，一面又非難有積極作用的藝術的先生們，以及別有用心，怕人讀文學書什麼的的「指導者」們。

或曰，中國的藝術，有些是很落後，很低級的，比如舊戲之類。但舊戲之類之所以落後，所以低級，這因為有學術思想的人不肯過問，有權力的人讓它目生自滅的原故。落後的，低級的藝術之所以能在民間存在，爲人民所歡迎，是因為人民自己也落後，也低級的原故。不從政治上改善人民生活，從文化教育上提高人民水準，而空談提高藝術，縱然可能，也不過使藝術變成駝四儂六的文章，平仄仄仄的詩詞，無論雅人們怎樣阿嗜，俗人總是高攀不上的。現在的問題是應該怎樣推進落後，低級的藝術，而不是因爲它落後低級就反對它，鄙視它，消取它。

## 老子的全集

讀完了一篇向培良底近著：出關。

老子心造了一些幻象，以為到處都有「儂家」在迫害他，於是一路「風聲鶴唳」，踉踉蹌蹌地跑出國去。過關的時候，關尹喜請求他「留點教訓」，於是就著書，「要把從前所教給孔子的一併推銷」。可是後來却感到「寂寞」，自以為不過「拿后羿，蓬萊作藉口，一齊都堆在孔子那個目標之上罷了」。『過去之挨命挨爭，挨命把敵人張揚得非常大，以便把自己也看得非常大，甚至於挨命幻想許多敵人而終至於以幻想為事實，都不過為逃避寂寞罷了』。他自己說：『我難道終於只是從空虛走到空虛嗎？』

這樣的一個老子，實在有點兒「老而不死」，「自作自受」；他著的書，既然專門在想推銷「從前所教給孔子的」，足見出爾反爾，一文不值了。

無論把老子畫成一幅怎樣的臉嘴，都隨作者底尊便，反正老子已經死了，死了幾千年，放心罷，他不會從棺材裏頭爬起來同一槍的。

不過說孔子以及儒家底迫害，全都是老子底「幻想」或「張揚」，似乎有點問題。蓬萊射死了老師后羿的事是有的，或者現在也還有：「孔子那傢伙曾經做過我底學生的，竟敢向我說這樣的話，什麼『烏鴉』，魚傳沫，細腰者化，有弟而兄啼。」他這簡直明明向我要挾，要我讓開……」，也正是向培良底這作品裏的話；老子死了之後，那些「儒家」的蒼蠅們世世代代，男男女女，都有罵老子的大作；一直到現在，他還逃不了毛延壽一樣的我們底畫師向培良底手筆！那末，他在前的抗爭，果真是多餘的麼？

最不可解的是，從那作品裏，我們看不出作者對於孔子究竟取了什麼態度。假如老子應該奚落，那竊取了老師底本領，忘記了老師底「循循善誘」地傳「道」的情義，只顧稱皇帝，賣身投靠，甘為奴才底奴才，稍稍得意，就要捉老師，趕走老師，如果不是跑得快，也許會像蓬萊一樣，颯地一箭射來的浮薄青年，真

弄反而是應該容恕或者值得獎勵的麼？

作品裏還有這樣的話：

終於老子把他的書著成了。他整理就緒，交給尹喜，說：「我的作品都在這裏，並且都編製好了，趁我在的時候看清楚，免得將來編不成全集本。」

我們知道：老子底書，只有「五千言」，就是一篇文章。一篇文章，不能成爲「集」，更不能成爲「全集」，這常識，向培良大概是有的；但是爲要奚落老子，就只好和他底常識告了別。——如果老子還有其它作品，被當時的「儒家」懸諸「人主」禁止發行了，而向培良却深知這種秘密，自然又當別論。

如果創作不是等於造謠，在向培良底出關裏，就沒有老子底影子。老子曰：「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那「象」那「物」，不是別的，倒是向培良自己！

## 魯迅的褊狹與向培良的大度

向培良先生在南甯舊書樓上發現了兩期「狂飈週刊」，那是若干年前，他自已編的刊物；於是「真如忽遇故人，恍若夢寐。回想當年友人，盡都星散，又不覺愴然」了。這一「愴然」，就使他寫了一篇「狂飈週刊題詞」，發表於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一日的桂林播蕩報「文藝週刊」上。

這篇文章，除了「回想」了一些「當年友人」之外，還涉及到一個曾經是友人而後來不是了的魯迅。文曰：

十六年初，狂飈社與魯迅先生決裂，那時候我們的思想已與魯迅先生漸分離。他性情猜忌，睡眠不忘，又不肯下人，所以不知覺中被人包圍，營了偶像，漸漸失去他那溫厚的熱情，而成了辛辣的諷刺者和向四面揮戈的不能自己的鬥士……此後，魯迅先生全部的精力消耗於攻擊和防禦中，瑣屑爭鬥

，猜疑自苦，胸襟日益褊狹，與青年日益遠離，卒至於淒傷消盡以死。

如果我的記憶不算太壞，向培良先生在文章裏攻擊魯迅，這並不是第一次。魯迅生前的事且不說，死後不久，向先生曾發表過一篇小說：「出關」。題材和魯迅的「出關」一樣，內容却是專門罵魯迅的。他用老子影射魯迅，用孔子影射自己，說老子心造了一些幻象，以爲到處都有「儒家」在迫害他，所以不得不逃到關外去；而著書的時候，就「要把從前教給孔子的一併推翻」；終於自以爲「過去之拚命把敵人張揚得非常大，以便把自己也看得非常大，甚至於拚命幻想許多敵人而終至於以幻想爲事實，都不過爲逃避寂寞罷了。」（引號裏的話，都採自向著「出關」）。與現在魯迅「四面揮戈。不能自己」；「瑣屑爭鬥，猜疑自苦」等語，完全一致。

魯迅也許真地「褊狹」，比如章士釗、陳西滢以至張資平、穆時英、杜衡等輩，就確實沒有受到他的寬容，人要不一「褊狹」，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太純潔了不行，太嚴肅了不行，太真誠，太正直，乃至太有知人之明了也不行。因爲，

將來社會裏的人不得而知，今天爲止的人們，和純潔、嚴肅、真誠、正直這些字樣相反的特色，究竟居多數，要把那些蠅營狗苟，奴顏婢膝，昏夜乞憐，白晝騙人的各色人等，俱收並蓄，無不寬容下去，自然也許是一種美德，不過，我總疑心那所謂「胸襟」也者，其實是弄堂裏的垃圾箱。章陳諸公且不談，如恭賀迅當年，對於張穆等輩，簡直不會「揮戈」，今天，讀他的書的我們該會怎樣地引爲遺憾呢！

然而細心地讀過了魯迅的書，真正懂得魯迅的人，應該明白魯迅雖然不揮擲發社會的黑暗，但是對於一些個人，幾乎從來沒有挑撥過。一橫眉冷視千夫指，俯首甘爲孺子牛，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這是魯迅的詩，它不但寫出了魯迅的某一時期的情景，也部分地說明了魯迅的爲人處世的態度。人們常以爲中國人的特性是「中庸」，兵燹上也留着窮寇莫追之類的話，其實都是騙人的。正因爲許多人中庸而又喜歡追窮寇，不斷地向魯迅進攻，逼得他無路可逃，這才不能不同身應戰。在「答楊邨人先生的公開信」裏，他引舉了許多事實

之後說：「先生，這還不夠退讓麼？」他已經把自己的真面目揭露給我們了。尤其是對於向培良先生，更可以看出魯迅的對朋友對青年的仁至義盡來。思想早已「分離」，不是連向先生現在也公開承認的麼？然而魯迅知道自己的筆的斤兩，爲了愛護一個還算有才能的作者，希望青年朋友還有向上的可能，就從來不讓自已談到向培良先生，甚至於別人談到的時候也不插嘴。「周先生對向培良，到現在還是希望著的。」許廣平先生有一回對我講。從「中國新文學大系」，我又看見魯迅對向培良先生的作品的極懷好感的稱述。如果魯迅真是「褊狹」，找出一兩個缺點，加以若干的曲評，似乎不算什麼難事。魯迅全集雖然現在與此地不十分容易入手，但究竟不是偏僻書，如果肯翻翻，就可以發見留在那裏的向培良先生的尊容，比有些「戰友」們的還要漂亮得多。

和魯迅對於別人的不「褊狹」相反，別人對於魯迅却常常是「褊狹」的。「先生，這還不夠退讓麼？」這一句話一面固然表明了他自己對別人的退讓，也就是不「褊狹」；同時也表示了別人對他的不退讓，也就是「褊狹」。這「褊狹」



，並且沒有因為魯迅已經死了而有什麼改變。人們常說學習魯迅的戰鬥精神，尤其是韌性的戰鬥，幾乎說成濫調了。其實有這種精神的何止魯迅一個？前些時，沈從文教授在國文月刊上評論魯迅的文章那態度，那說法，和他歷來所有的態度和說法，決沒有兩樣。沈從文教授何嘗不是在「戰鬥」，又何嘗不是「韌性」的戰鬥？現在向培良先生又在說魯迅的性情和胸襟了：那態度，那說法，和他的「思想」與魯迅「分離」以來的，也決沒有兩樣。向培良先生又何嘗不對魯迅「戰鬥」而且「韌性」呢？所不同的不過是戰鬥的方向和魯迅的剛烈相反，或者說剛剛面對着面罷了。

而且所有的戰將中，向培良先生的戰法是最為可怕的。他說魯迅「猜急」，「不肯下人」，「猜疑」，「褊狹」，「拚命把敵人張大得非常大，以便把自己也看得非常大，甚至於拚命幻想許多敵人而移至於以幻想為事實」，換言之，就是，別人並沒有對不起魯迅，並沒有把他當作敵人，一切的事情，都不過由於魯迅自己的「性情」和「胸襟」上的缺點所「幻想」，「張揚」出來的。這樣一來

不但較自己和魯迅的「思想」「分離」這件事顯得冠冕堂皇，天公地道，同時也替一切圍剿過魯迅的戰友們洗刷得干干净净了。人們多麼可笑啊，他們說魯迅有什麼戰績，如果有，豈不就是打風車麼？說魯迅的一生就是殺門的一生也者，如果是，豈不就是打風車的一生麼？而魯迅生前，也真會有人叫他爲「黨魯迅」的。幸而向培良先生還未必是登高一呼，應者雲集的英雄；否則，這對於魯迅是如何致命的一擊啊！向培良先生對於別人，也許毫不「褊狹」，但對於魯迅，據我所知，他是像伍子胥鞭打楚平王的屍骸一樣地鞭打過兩次了。我不知道和「褊狹」對立的，是不是就是大度，也不知道說別人「褊狹」，是不是因爲自己大度，如果是，向培良先生一次兩次地鞭屍，莫非倒是大度的表現麼？如果是，和魯迅的「褊狹」倒是一個極有趣的對照。

一九四〇、一一、一七、桂林。

### 從沈從文筆下看魯迅

周作人和魯迅作品……一個近於靜靜的禱白，一個近於慷慨的咒語。

個充滿人情溫暖的愛，理性明達虛靜，如秋天、如秋水、於事不痛。一個充滿對於人事的厭憎，情感有所蘊塞，多情激，易激怒，語言轉見出異常天真。

周作人的小品文，魯迅的雜文，在二十年來中國新文學活動中，正說明兩種傾向，前者代表田園詩人的抒情，後者代表艱苦鬥士的作戰。一取退隱態度，只在消極態度上進窺人生，大有自得其樂意味。一取迎戰態度，冷嘲熱諷，短兵相接，在積極態度上正觀人生，也儼然自得其樂。對社會取迎戰態度，所以魯迅的作品，便充滿與人與社會敵對現象，大部分是對世文章。

以上是沈從文先生在鵝文月刊第二期「習作舉例」裏對周作人和魯迅所下的判斷。另外還說魯迅的文章「感慨沉痛，在新文學作品中實自成一格。另外一種哀感是冷嘲，對世。……」

沈先生的意見，本來有時候是很費解的。比如：說周作人「二十六年北平論

陷後，尙留故都，即說明年齡在一個思想家所生的影響，如何可怕（同文），把一個極端嚴重的問題看成一個「年齡」的「影響」，簡便自然很簡便，但「年齡」是指老而言，却未免忘記了魯迅就是周作人的哥哥，哥哥一定比弟弟更老，「年齡」何以沒有在魯迅身上發生「可怕」的「影響」呢？

但對於這兩兄弟所下的判斷，却是相當確切的。關於周作人的部分，我不想談；評魯迅的那些話，其實就和崇奉魯迅的人們所說的「差不多」，雖然沈先生是以反「差不多」為職志的。崇奉魯迅的人們筆下的魯迅，我們看得太多了，什麼改革思想，什麼戰鬥精神，什麼現實主義……老實說，人就會很容易想到：正因為他們是魯迅崇奉者，所以不能不這樣吹捧的。沈先生不是魯迅崇奉者是周知的。連沈先生也說魯迅「代表悲苦的鬥士作戰」，「迎戰態度」，「在積極態度上正視人生」，足見魯迅崇奉者筆下的魯迅，並不是什麼阿好的私言。從這一意義上看，沈先生的一句話，得別人的十句百句。

然而，「對於人事憎厭，構成有所寂寞」，什麼「憤激」，「惱怒」，「罵

畫」，「冷嘲」，這些不十分表示敬意的字樣，却很容易使老實的讀者們迷惑的。自然，我們應該原諒沈先生，天下看起來像是表示敬意的詞句只有那幾句，最貴的詞句，沈先生就用在對徐志摩的作品上（「習作舉例」第一篇是：「從徐志摩作品學習抒情」），其次的也都用在對周作人的作品上。而且，如果把魯迅也看得和徐志摩周作人一樣好，把魯迅看作和徐志摩周作人完全是一類的或者是「差不多」的作家，那不但沈先生不肯，就是讀者的我們也會不肯的吧。

如果魯迅真是一個憎厭人事，感情嚴寒，憤激惱怒，罵世冷嘲的作家，那麼，他的作品會有什麼價值呢？又怎能「自成一格」，「代表」一種「傾向」呢？或者有人會這樣發問。我想在這裏加一點解釋。

先說憤激惱怒，感情嚴寒等字樣。這似乎是一種新的說法。但是不是有人說魯迅的文章是「無病呻吟」麼？魯迅自己答辯：

即如自胡語直至屁股等等，倘使相安無事，誰愛去紀念牠們……待到慨然於「頹頹難狀」，「碎肉復生」的時候，是早已別有緣故的了，所以「呻

片」。而批評家們曰：「無病」。我實在懷疑他們的健康。

——從胡謔說到牙齒

關於感情的問題也正如此。天下儘有「如秋天，如秋水，於事無隔」的人物，但那都是懂得「豔羨」的「健康」的人們，決不是魯迅。魯迅既然要「迎戰」，既然要「正視人生」如沈先生所判斷，那就如現在正在前綫搏鬥生死的將士一樣，難免有憤激，惱怒，敵愾之處，是很難以秋天秋水期望他們的。

某次說到「罵世」。魯迅自己是并不諱言罵的。他說道：

我想，罵人是中國極普通的事，可惜大家知道罵而沒有知道何以該罵，難該罵，所以不行。現在我們須得指出其可罵之道，而又繼之以罵，那麼，就很有意思了，於是就可以由罵而生出罵以上的事態來的罷。

——通訊（據報副刊）

但這還只就一般人所認為罵的罵而言，其實罵與非罵，是有一條明確的界限的。魯迅說：

假如你到四馬路去，看見妓女在拖住人，向大聲說：「野鷄在拉客」，那就會發她罵你是「罵人」……但事實呢，却的確是「野鷄在拉客」，這不過只可心裏知道，說不得。在萬不得已時，也只能說「姑媳虧浪做生意」……這才不是罵人……

——論諷刺

這意思似乎很明白；如野鷄真在拉客，縱然直斥之曰「野鷄拉客」，這不過指出了事實的真實；雖然被罵者或者別人會罵是罵，其實倒不是罵的。只有讓良爲婚，含血噴人，才是真的罵。魯迅的「指出其可罵之道」的「很有意思」的罵，是不是應該稱之爲罵，不是很明白的麼？

但沈先生也並不一定以爲只有魯迅的作品才是罵。在他看來凡是批評辨論的文章也都是罵，除了他自己對於別人所加的一些難堪的字樣。請原諒我的頭腦，沈先生的專集我很少拜讀，不知道發抒了這樣的偉論的大文，搜集在什麼書上；但翻翻魯迅的「且介亭雜文二集」，就看見有一篇「七論文人相輕——兩傷」，是專爲沈先生的「談談上海的刊物」而發的，那裏面引用過沈先生（那時候沈先

生用的筆名是「綉之」的一段文章，現在轉錄如次：

「說到這種筆鬥，使我們記起太白、文學、論語，人間世幾年來爭鬥的成績，這成績就是凡罵人的與被罵的一古腦兒變成丑角，等於木偶戲的互相揶揄或以頭互碰，除了讀者養成一種「看熱鬧」的情趣以外，別無所有……我們是不是還有什麼方法可以使這種「私罵」佔篇幅少一些……」

魯迅會指出沈先生（或者說綉之先生）對於無論什麼論辨，一律稱為「私罵」的態度，猶如「知縣老爺出巡，路遇兩人相打，不問青紅皂白，謾是謾非，各打屁股五百完事」。而且說：「縱使名之曰『私罵』，但大約決不會件件都是一面等於二加二，一面等於一加三；在『私』之中，有的較近於『公』，在『罵』之中，有的較合於『理』的。居然來加評論的人，就該放棄了『看熱鬧的情趣』，加以分析，明白的說出你究以為那一面較『是』，那一面較『非』來。」但這自然只是一個小百姓的請求，在「知縣老爺」，却還是以「各打屁股五百完事」，為最簡便。所以沈先生的態度和用語都一直保存到現在。



再說「冷嘲」。沈先生沒有下過怎樣的注解，要知道什麼是冷嘲，這是只有到魯迅的文章裏去找：

如果貌似諷刺的作品，而毫無善意，毫無熱情，只使讀者覺得一切世事，一無足取，也一無可爲……這便是所謂「冷嘲」。

#### 什麼是諷刺

魯迅的作品是不是毫無善意和熱情，使讀者只覺得一切世事，一無足取也一無可爲呢？不必別求證明，沈先生就說魯迅「態度積極」，作品「感慨沉痛」。既然態度積極，就不是毫無善意和熱情，既然感慨沉痛，就不是讀者得到的只是不足取，無可爲……也就不是冷嘲。

剩下的就是「憤懣」，「恨恨」這些字樣。說魯迅的作品裏有很多憤恨的感情，別人不知道怎樣，我個人是并不抱什麼反感的。問題是沈先生把魯迅的憤恨和周作人的「充滿人情溫暖的愛」對比地說，以爲愛與憤只是絕對相反，而毫無相成之處，似乎不算知言。有所愛，就不能不有所憎；只有憎所應憎，才能愛所當

愛。用目前一個極淺近事例：正因為我們愛中華民族，才不能不惜日本帝國主義；只有憎日本帝國主義恨到底（打倒），才有中華民族存在來被我們愛。魯迅在上面引過的「兩傷」里，曾對沈先生講過：

在現在這「可憐」的時代，能殺才能生，能憎才能愛，能生能愛，才能文。

在「再論文人相輕」里也說：

文人還是人，既然還是人，他心里就仍然有是非，有愛憎；但又因為是文人；他的是非就愈分明，愛憎也愈熱烈……

他得像熱烈地主張着所是一樣，熱烈地攻擊着所非，像熱烈地擁抱着所愛一樣，更熱烈地擁抱着所憎——恰如赫爾庫來斯的緊抱了巨人安太烏斯一樣，因為要折斷他的肋骨。

進一步說：天下也儘有表面上是憎而實際却是愛的。並不是像朱熹所說：「其詞若有憤語，其實乃深喜之」之類；而是耶穌的「這字認而又不信的世代呀，

我什麼時候才能離開你們」之類。耶穌的愛，大概不會有人否認吧。魯迅的許多作品也正如此。關於這，魯迅是否有過直接的解釋，我忘記了。但對於類似的事情的解釋是有的：

例如詩阮的罪名，一向說他們毀壞禮教，但據我個人的意見，這判斷是錯的。魏晉時代，崇奉禮教的看來似乎很不錯，而實在是毀壞禮教，不信禮教的。表面上毀壞禮教者，實則倒是承認禮教，太相信禮教。因為魏晉時所謂崇奉禮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過偶然崇奉，如曹操殺花蠱，司馬懿殺嵇康，都是因為他們和不孝有關，但實在曹操司馬懿何嘗是著名的孝子。不過將這個名義，加罪於反對自己的人罷了。於是老實人以為如此利用，裝了裝教，不平之極，無計可施，激而變成不談禮教，不信禮教，甚至於反對禮教！但其實不過是態度，至於他們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禮教，當作寶貝，比曹操司馬懿還要迂執得多。……總算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由此可知，說魯迅的作品只是借債，憤恨，頭沒有熱愛，自然或排，若定自

以爲有和剛作人一樣的「人情溫暖的憂」，而沾沾自喜，以爲可以對魯迅驕傲，那倒不像「慶童」，那態度也就「轉見出異常天真」了。

其實，沈先生是聰明人，既然知道魯迅的正視人生的，迎戰的積極態度，又何嘗不知道魯迅的作品並非冷嘲罵世乃至只有憎恨而已呢？其所以仍舊這樣說者，蓋別有苦衷在焉。

現在人們常常開口學習魯迅，閉口學習魯迅，這意思決不僅是說學習魯迅寫小說，寫雜文，翻譯翻譯外國書而已；主要的恐怕倒是要學習魯迅的正視人生的迎戰態度。嗟乎，如果這樣，則魯迅豈易學哉！若正視人生，則人生實有其不盡美好之處。看清楚了之後，總難免要這樣說，那樣搖搖，勢必至成爲「人生」亂兜派，而被不正視或熟視無睹或裝作無視的「人生」謳歌派所深惡痛絕。向社會迎戰，必是那「社會」有可戰之道，有對戰之人，又勢必至被「社會」所深惡痛絕。我們常常說：魯迅一生的歷史就是戰鬥的歷史，其實只說出了一面；就另一面說，魯迅的歷史就是被「社會」圍剿的歷史。魯迅幸而終其身未罹蹂躪之憂，得

保首領以沒，學習魯迅的人，却不見得人人都有這種幸運的。豈但學習魯迅，就是評論魯迅，真也談何容易！如果對魯迅多事推崇，就無異表示和魯迅站在一邊，也向或養成向社會迎戰，魯迅的遭遇以及魯迅所承受的災禍，都有落到自己頭上的危險。這場合，最好是無視人生，放棄社會，把一切都歸之於魯迅個人感情上的缺點；倘對魯迅又略加褒揚，則於社會，於魯迅也就面面俱到，自在圓通，獲果比，參政議，臧否人物，放論文章，都不減於周作人氏之一。如秋天，如秋水，於事無隔了。問題是在讀者，他們應該明白：怎樣的人物筆下，只能寫出怎樣的魯迅來。

一九四〇，一一，五，桂林。

### 略談魯迅先生的野草

彷彿有人說過，波特來爾的惡之花是新的頹條。我不懂波特來爾，惡之花又只看過幾點斷片，至今印象毫無，說不清與頹條有關沒有。但對於魯迅先生的野

舉，却實在感到了這樣的。

孔子曾盛稱「一闢雖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所以詩以排側纏綿，溫柔敦厚爲主；擴大開來，中庸的思想，也都以中庸爲正。不情之謂中，不易之爲庸，就是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治御。舍乎此，不是過火，就是不及，都屬於偏激者流，爲中國的傳統思想所不許的。魯迅先生的思想本來是反傳統的，而野草却最爲特色，全部是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毫無溫柔敦厚，不偏不易之氣。野草中間所表示的絕望，是真實的絕望以上的絕望；表示的憎恨，是真實的憎恨以上的憎恨；而他所看見的黑暗，也是真實的黑暗以上的黑暗；所感到的寂寞，更是真實的寂寞以上的寂寞。

郭沫若曾有「首詩，燧燻天狗」大意是說天狗爲熱憤所苦，無可奈何，把太陽也吃了，月亮也吃了，而且把自己也吃了。野草中也有如此情況，那是由于許多苦痛的经验教訓所養成，覺得天下事無一可爲，也不知如何爲，而偏又不能不爲，爲的四面碰壁。待得東來西又倒，甚苦連自己也從淹埋在唾罵中，不爲又目

擊一般，這初的良民們，生不知如何生，死不知如何死，生不如醉，死不如夢，而人類的暴虐則高踞在這些活的屍骨，死的生命上，饕餮着人肉的筵席。而自己編是這些良民中間一個，而自己編是這些良民中間的覺醒者！宛轉呻吟，披髮大叫，遍體搔抓，捶牀頓足，自己也不知道在幹什麼，爲什麼，要什麼。文藝是苦悶的象徵，也許還有多少商討餘地，但在對魯迅先生的野草的場合，却極爲確切。

有一游魂，化爲長蛇，口有毒牙。不以驚人，自贖其身，終以頹廢。……

扶心自食，欲知本味。劍痛酷烈，本味何能知？……

滿室之穢，餘徐食之。然其心已穢舊，本味又何由知？……

### ——墓碣文

這就是野草的最好的自序。野草里的文章幾乎每一個字，都是在這樣一種心情之下寫出的。

我的心也曾充滿過血腥的歡呼：血和淚，冰和火，被殺和報仇。而報仇是

些都空虛了。但有時故意地填以沒奈何的自欺的希望。希望，希望，用避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虛中的暗夜之襲來，雖然盾後面也依然是空虛中的暗夜。

——希望

有所不樂意的在天堂里，我不願去；有所不樂意的在地獄里，我不願去；有所不樂意的在你們將來的黃金世界里，我不願去。然而你就是我所不樂意的……我不願去。

——影的告別

我將得不到布施，得不到布施心；我將得到自居于布施之上者的煩膩，疑心，憎惡……我至少將得到虛無。

——求乞者

于是人生不過是走到墳去的「遊客」，人世間到處都是「頹敗線的顫動」，原來是饑寒殺戮的路人（復仇），乃至釘死人之子的兇手（復仇其二），「好的故事」，不過是夢，而值得追復的反而是「失掉的好地獄」！還有比這更可怕的



麼？

魯迅先生雖有三十年的創作生活，但成爲被注目的作者却是從五四時代開始。五四運動，有人比之爲歐洲的文藝復興；文藝復興的思想主潮，被稱爲人的覺醒，五四運動也正是這樣。關於中國的人的覺醒的內容，我已在別的文章上談到過，這里不再贅述。自然五四運動中的各個戰將的思想，都離不開人的覺醒這一主潮，但就每個人的全部戰績全部歷史看來，最足以作爲代表的卻只有魯迅先生。

然而「人生最痛苦的是夢醒了無路可走」（娜拉走後怎樣）。最單的覺醒者或者說覺醒者的初期，往往只是寂寞的個人，「叫喊于生人之中，而生人并無反應……如置身無邊際的荒原，無可措手」（吶喊自序）。而自己又偏要對於尚未覺醒的同胞，「較永久地悲憫他們的前途，然而仇恨他們的現在」（復仇），「自己背着因襲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于是天下從此多事矣了。

野草的創作期間，是五卅，三一八前後，「淡淡的血痕」，就是爲紀念三一的死者而寫的。這時候也正是國民革命軍北伐以及大革命的前夜，帝國主義的侵略加緊，北洋軍閥的統治頹于崩潰，因之也更爲殘酷，官僚政客乃至所謂文人學者們的面孔也更爲醜劣。自辛亥革命以來，中國經過種種的改革，但每一種改革，幾乎都是虛偽，欺騙，換湯不換藥。如果不進一步覺悟到只有澈底革命才能挽救中國危亡，解除民生痛苦，則對於現實感到幻滅，絕望，是必然的。

有人說魯迅先生的世界觀，是由進化論轉變爲革命論，也有人覺得他的思想只有發展，無所謂轉變。這樣的嚴重問題，我一向不敢插嘴，現在重讀野草，覺得他固然確有不變的東西，但也確有不妨稱之爲轉變的東西。野草就是舊的世界觀發展到極致，走到絕境，碰到現實的壁上所爆發出來的燦爛的火花。

什麼是他的不變的東西呢？戰鬥精神和悲天憫人的情操。在野草里曾歌頌「這樣的戰士」，而「淡淡的血痕中」又說：

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間，他屹立着，洞見一切已改和現有的廢墟和荒墳，

記得一切深廣和久遠的苦痛，正視一切重疊淤積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將生和未生。他看透了造化的把戲，他將要起來使人類蘇生或者使人類滅盡，這些造物的良民們！

絕望下應該絕望的，憎恨下應該憎恨的，以真實的黑暗為黑暗，以真實的寂寞為寂寞，毫不粉飾敷衍，欺人自欺，就正是「敢說，敢笑，敢哭，敢罵，敢怒，敢打」，「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敢于正視淋漓的鮮血」的魯迅先生的本來面目，也是使他的思想轉變的重要因素。

野草是魯迅先生為自己寫，寫自己的書，是理解他的鎖鑰，是他的思想發展的全程中一個重要的樞紐，不過，同時也是整個中國文化思想不能不向前邁進一大步的忠實的反映。

一九四〇、一〇、一五。

二之書叢草野

# 秘奧的史歷

每冊實價	國幣	一元
外埠加郵費		

印	總	發	發	著
刷	經	行	行	
者	售	者	人	者

國	科	文	夏	紺
光	學	獻	雪	
印	書	出	清	
刷	店	版		
廠		社		

桂林府前街十四號  
桂林八桂路十四號

究必印翻	•	有所權版
------	---	------

版初月六年十三國民華中

